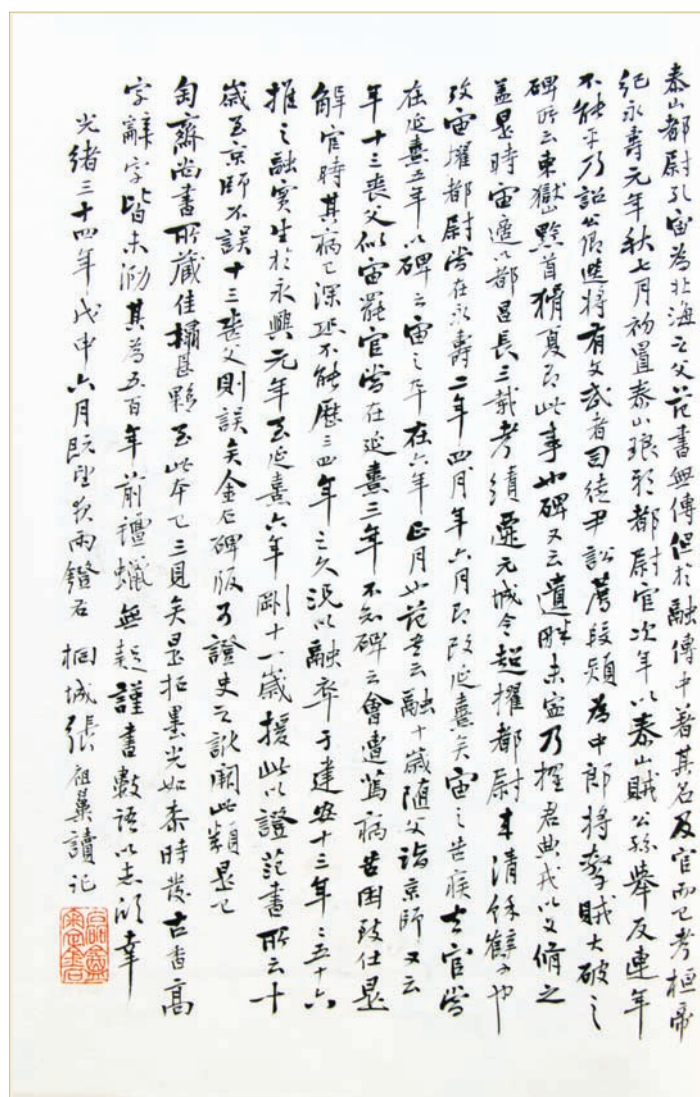


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藏 秦漢碑拓初探



張祖翼〈孔宙碑〉跋（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藏，影像作者提供）

張忠煒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

古今論衡 第 25 期 2013.11

近十餘年來，國內外不少知名博物館、圖書館等文博或教育機構陸續整理出版館藏中國金石拓本，大豁閱者之目。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金石拓本菁華》、《中國國家圖書館碑帖精華》、《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故宮博物院的《名碑善本》、《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碑帖》等等。與之同時，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之《中國碑刻全集》，「是以大陸內外博物館、圖書館和私家收藏的重要善本和孤本編輯而成。」^①然而，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所藏中國金石拓本，不論其價值如何，度藏庫房近百年而罕為人知，以之為研究對象者更是鳳毛麟角，不得不說是憾事一樁。本文擬結合菲爾德館藏秦漢碑拓，敘說其收藏緣起，所藏秦漢碑拓精華，題跋所見相關問題，從而揭示拓本及手書題跋之價值。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學界關注這一寶藏。

一、菲爾德博物館收藏中國金石拓本緣起

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或譯為富地博物館，全稱為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作為全美乃至全球最為知名的自然博物館之一，菲爾德博物館集收藏、探險（早期尤為突出）、考古、調查、研究諸功能於一身。其藏品分人類學、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環境・文化・保護五類，所涉地域遍及全球，年代跨越古今，數量以百萬計，可謂煌煌又煌煌。中國金石拓本藏品屬人類學部，以碑、帖為主，範圍稍顯駁雜，有金石、磚瓦、畫像磚石、封泥印璽，甚至還包括古籍類的《中國猶太人家譜集錄》等等。

菲爾德金石拓本的數量、種類，較之中、日及臺灣的文博或教育機構而言，或略顯遜色；然東亞之外收藏中國金石拓本最多者，大概非菲爾德莫屬，堪稱富甲海外。東洋文庫藏有中國石刻拓本約三千種，^②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約二千七百種，^③菲爾德最新統計約有三千七百種，^④藏品之豐可見一斑。不僅如此，館方先是在一九

* 本文係「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之一（10XNJ030）。

① 《中國碑刻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碑刻全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凡例〉。

② 東洋文庫編，《東洋文庫所藏中國石刻拓本目錄》（東京：東洋文庫，2002），〈序〉，頁1。

③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碑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碑刻瑣寶・海外遺珠（序）》，頁2。按：周欣平寫道：「至今，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金石拓片約二千七百餘種，兩萬八千餘份……數量上僅稍次於芝加哥費爾德博物館（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是全美收藏金石拓片最多的圖書館之一。」

④ 不同時期藏品數量、種類的統計有別。Hoshien Tchen（陳和銓，字孟釗）在《拓本聚瑛・序》中提及近3,000種，4,000餘件；菲爾德官網提供的資料是7,500餘件；筆者電子郵件詢問館方（2012.1.13），得知最新統計目錄編號是3,700種，6,510件。陳氏推測「斐爾德博物館的中國拓本度藏，可能是西方世界中收藏最豐富的」；參上註引周欣平語，更可確定此點，只是藏品種類、數量的精確統計仍有待時日。分別參見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atalogue of Chinese Rubbings from Field Museum*（《拓本聚瑛》），edited by

三九至一九四四年間，以收集者筆記為基礎而由 C.Y. Hu 和 Rose G. Miller 編寫拓本目錄初稿（或稱 Hu-Miller Catalog）；從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開始，由 Kenneth Starr 與陳和銑等人合作，修訂並續編目錄，至一九七〇年代初完成，於一九八一年正式出版《拓本聚瑛》一書。^⑤這是英語世界第一部有關中國金石拓本的目錄書，較之國內外同類目錄書的出版不可謂不早，^⑥內容亦不可不謂之充實。^⑦

行文至此，難免令人好奇生問：菲爾德博物館的中國金石拓本是何人、何時收集而來的呢？答曰：大部分藏品是由勞費爾在上世紀初收集而來。

Berthold Laufer（1874-1934），或譯為洛佛爾、洛阜福，或譯為勞費爾，作為知名德裔美籍漢學家，對中國學界來說，並不陌生。其去世後十多天，賀昌群就寫作〈悼洛佛爾氏〉一文，簡要述其生平、業績，文短而切中肯綮，意深而躍然紙上。^⑧二十八年後，邵循正在勞費爾的代表作《中國伊朗編》中譯本〈序〉中，亦曾簡要介紹其生平、本書主要觀點、研究方法，以及此書對研究伊朗古史和西域史的重要意義。^⑨惟兩文所論各有側重，且當時所知信息有限，故勞費爾的中國金石拓本收集，並不在學者關注範圍之列。不僅中國學者如此，歐美學界的訃告或悼念文章，^⑩亦如此。可能在勞費爾的煌煌業績中，中國金石拓本收集並非主要，是其較少受關注的原因吧。實際上，除少數幾篇論著外，^⑪勞費爾很少利用金石拓本做研究；但這些為數不多的論著，頗具新意。如對畫像石中戰爭圖的解讀，他認為是依固定的模式構圖，

Hartmut Walravens, *Fieldiana Anthropology*, New Series, No.3 (1981), pp. xvi; 又參見菲爾德博物館中國拓本主頁，網址：<http://archive.fieldmuseum.org/chineserubbings/>；陳〈序〉後由錢存訓、戴文伯譯為中文〈芝加哥斐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藏拓本聚瑛序言〉，《大陸雜誌》66.4（1983）：47-49。

⑤ Alice K. Schneider, "Records from Stone," *Field Museum Bulletin* (1982.1): 12-17.

⑥ 譬如，一九五六年孫貫文編著《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金石拓片草目》，一九五九年首都圖書館編《館藏北京金石拓片目錄》，一九八三年臺灣出版《國立中央圖書館金石拓片簡目》，一九九〇年徐自強主編《北京圖書館藏墓誌拓片目錄》。

⑦ 本文殺青時，見到程章燦介紹《拓本聚瑛》的文章。程氏似是大陸最早且系統介紹菲爾德博物館中國金石拓本的學者，指出菲爾德博物館中的幾方唐代墓誌拓本為國內所不見或罕有流傳，頗有意義；惟程文與本文所論各有側重，且部分觀點分歧明顯，感興趣者不妨兩參。參見程章燦，〈拓本聚瑛——芝加哥富地博物館藏中國石刻拓本述論〉，《中國文化研究》2012.3：27-35。

⑧ 賀昌群，〈悼洛佛爾氏〉，《賀昌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卷三，頁549-555。

⑨ 美·勞費爾（Berthold Laufer），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序〉，頁i-v。按：此書又有杜正勝譯本。或許是因當時特殊政治環境所致，杜氏翻譯此書時未提及林筠因譯本。杜氏在〈譯言〉中對勞費爾亦有簡單介紹。參見杜正勝譯，劉崇鉉校訂，《中國與伊朗：古代伊朗與中國之文化交流》（臺北：中華書局，1975）。又，新近學界對勞費爾的研究，參見龔詠梅，〈勞費爾漢學研究述評〉，收入朱政惠主編，《中國學者論美國中國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頁236-251。

⑩ Walter E. Clark, L.C. Googrich, A.T. Olmstead, J.K. Shryock,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4.4 (1934): 349-362; J. Eric Thompson and R.L. Hobson,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Man* 35 (1935): 28-29; Arthur W. Hummel (恆慕義),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38.1 (1936): 101-111.

⑪ Berthold Laufer, *Chinese Grave-Sculptures of the Han Period* (New York, London & Paris, 1911); Berthold Laufer, "Confucius and His Portraits," *Open Court* 26 (1912): 147-168, 202-218; Berthold Laufer, "Five Newly Discovered Bas-Reliefs of the Han Period," *T'oung pao* 13 (1912): 107-112.

故不可能反映墓主生前的特定事蹟，至今仍為學者肯定。¹²

隨著時間的推移、《拓本聚瑛》的編著、勞費爾檔案的整理及相關研究的刊佈，¹³使得我們可據此大致梳理出菲爾德博物館中國金石拓本的收藏歷程。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勞費爾作為美國自然博物館（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代表（圖一），率領由 Jacob H. Schiff 資助的探險隊，在中國展開探查活動，金石拓本即為此行收穫之一。藏品最初置存於美國自然博物館，一九二三年被館方作為禮物贈送給勞費爾，後來又作為勞費爾的遺贈物而歸菲爾德博物館。勞費爾自述這批拓本有 3,336 件，由其監督嫺熟拓工椎拓而來。他之所以會對拓本產生濃厚興趣，是基於以下認識：歷史資料對研究中國文化各方面具有頭等重要意義。正因為此，每當他有所收穫時，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在給 Franz Boas（或譯為鮑亞斯，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的信中，勞費爾寫道：「我發現了多於 25 件的漢代石刻雕塑，且至今仍未為中國金石學者及外國學者所知」（1904.2.10）。勞費爾第二次中國之行（1908-1910），探查地域是在中國西部及西藏，但也有拓本之類的收穫。在館方提供給筆者的拓本信息中，有一件明確標明是此次探查所獲（Blackstone Chinese and Tibetan Expedition），時間是一九一〇年。第二次所獲拓本的具體情況，目前尚無專文介紹，有待進一步調查。此外，一九二三年勞費爾最後一次中國之行，是否亦有拓本收穫，當下仍不清楚。



圖一.1：勞費爾像

（引自《勞費爾文集》〔1976 年起陸續出版〕，第一卷，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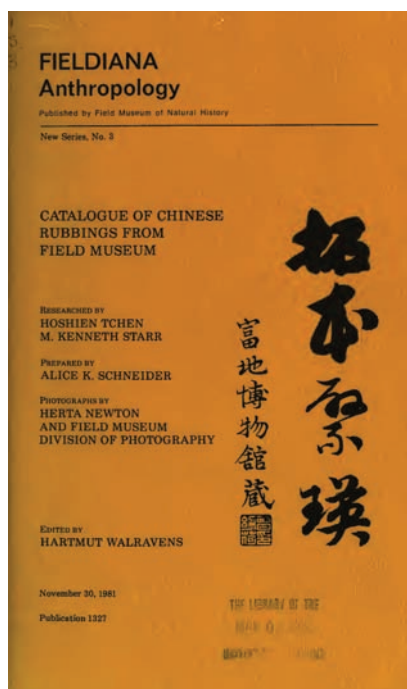
圖一.2：勞費爾像（圖右：1904 年，杭州）

（引自《勞費爾文集》〔1976〕，第一卷，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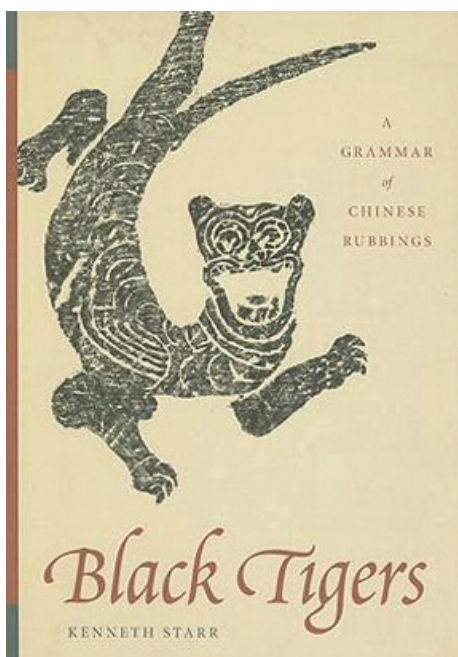
¹² 邢義田，〈漢代畫像胡漢戰爭圖的構成、類型與意義〉，《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碑與壁畫》（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318。

¹³ Hartmut Walravens, "Berthold Laufer and His Rubbings Collec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0.4 (1980): 519-522; 陳和銓，〈芝加哥斐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藏拓本聚瑛序言〉，《大陸雜誌》66.4 (1983)：47-49。按：本部分敘述若不標明出處，均源自兩文。

勞費爾的金石拓本藏品是菲爾德館藏的最重要來源。Kenneth Starr（或譯為史樂山）擔任菲爾德博物館東亞考古及人類學部主任時（1953-1970），使得館藏金石拓本的種類、數量也有所增加。David C. Graham（葛維漢，1884-1962）捐贈的拓本就在這時，而購入李宗侗（1895-1974）所藏拓本亦在此時。葛維漢在四川傳教三十餘年間（1911-1948），發表了不少有關川、藏地區的田野調查報告；但他收集的四川地區金石拓本，即便到了今天也未曾受到關注。¹⁴在《拓本聚瑛》裡明確地標注了那些藏品是出自葛維漢的捐贈，關於捐贈或編目的時間是在一九五七年。就漢代金石拓本來說（總計約 210 餘種），葛維漢藏品多是畫像磚石，約占全部種類的三分之一。擁有如此眾多的拓本藏品，可進行特展展覽，¹⁵亦可激起研究人員的興趣；Kenneth Starr 在離開菲爾德近四十年後，出版了第一部綜合研究椎拓技術的西文專著，¹⁶是書在科技史或印刷前史上所具有的地位不言而喻。（圖二）



圖二.1：《拓本聚瑛》書影



圖二.2：Black Tigers: A Grammar of Chinese Rubbings 書影

- ¹⁴ 美·蘇珊·R·布朗著，饒錦譯，〈在中國的文化人類學家——大衛·克羅克特·葛維漢〉，收入李紹明、周蜀蓉選編，《葛維漢民族學考古學論著》（成都：巴蜀書社，2004），附錄一，頁 212-264。按：該文是葛維漢的傳記，文中似乎未提及葛維漢收集的金石拓本。
- ¹⁵ Kenneth Starr, “Gift of Chinese Rubbings Goes on Special Exhibition,” *Chicago Natural History Museum Bulletin* (1957.12): 4-5.
- ¹⁶ Kenneth Starr, *Black Tigers: A Grammar of Chinese Rubbing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按：一九六〇年，Starr 曾到臺灣，停留九個月，查閱公、私所藏拓本，考察椎拓技術。菲爾德藏品中的現代刻石，如〈毋忘在莒〉（1952）、〈石門水庫紀念碑〉（1964）等等，大概就是由他收集而來的。此外，他還對菲爾德博物館藏〈張遷碑〉有研究（惲毓鼎舊藏），參見 Kenneth Starr, “An ‘old rubbing’ of the Later Han Chang Ch’ien pei,” In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 edited by David T. Roy and Tsuen-hsui Tsie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83-314.

勞費爾、葛維漢藏品椎拓的時間，多數是在晚清或民國前期；該館購入的李宗侗藏品，大概可視為名碑善本。李氏出身於晚清世家大族，本家（高陽李氏）、外家（南皮張氏）均顯赫；曾任職故宮博物院（1926-1933），參與故宮文物的清理與接收。抗戰時護送故宮文物南遷，故宮文物遷臺後又協助清點、整理，安頓國寶。¹⁷顯赫家世又精收藏，是李氏藏品質量的保證。菲爾德博物館藏宋拓本〈蘭亭序〉即為李氏舊藏；¹⁸下文著重介紹的七件拓本，亦為李氏舊藏。陳松長指出：〈蘭亭序〉入藏年代是在一九六〇年後，以下本文介紹藏品的入藏年代卻是一九六〇年（根據館方提供的拓本收藏信息），看來菲爾德博物館是在此年購入李氏藏品。如何購置這批藏品尚不清楚，筆者揣測與 Kenneth Starr、陳和銑有關。Starr 在菲爾德博物館任職時，陳和銑曾協助其進行金石拓本的編目。陳、李同為留法同學，彼此相知亦有通信；¹⁹陳與 Starr 既有同事朋友之誼，通過陳氏的紹介，因而 Starr 結識李氏並非沒有可能，由此機緣或許促成李氏藏品之入藏菲爾德吧。²⁰

李宗侗的藏品又多為端方舊藏，而端方是清末最富盛名的收藏及鑒賞家。學界對端方素有研究，²¹惟多側重於政治，其他方面較薄弱。²²端方的金石、書畫收藏，毀譽兼有。²³據說其早年不精碑版，為王懿榮訕笑：「爾但知挾優飲酒耳，何足云此（碑版）」；端方拍案，並發豪言：「三年後再見」，遂訪琉璃廠肆精於碑版者，並得李雲從（清末河北人，善碑拓）之助，購宋、明拓本及碑碣，相與朝夕討論，不三年「果負精鑒之名」。²⁴王國維〈蜀道難〉係哀挽端方之作，內有「玉刀三尺光芒靜，寶雞銅禁尤完整。孤本精嚴華岳碑，千言謨訓毛公鼎。河朔穹碑多輦致，中餘六代朱文字。丹青一卷顧長康，唐宋紛紛等自鄙」等語，²⁵所言即端方藏品菁華。實際上，端

¹⁷ 參見李宗侗，《李宗侗自傳》（北京：中華書局，2010）。

¹⁸ 陳松長，〈美國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藏宋拓蘭亭序跋〉，《文物》2010.2：87-95。

¹⁹ 參見李宗侗，《李宗侗自傳》，頁201-210。

²⁰ 陳氏在《拓本聚瑛·序》中說道：「我曾推薦購買一件很稀有的宋拓」，即宋拓〈蘭亭序〉，但並未寫明購自何處、購入時間，僅提及此拓有李宗侗跋文。宋拓〈蘭亭序〉及下文介紹的秦漢碑拓七種，均為李宗侗舊藏，陳氏不可能不知。隱去部分信息，恐是有意為之。又，大概在一九五〇或一九六〇年代，李宗侗的部分藏品售給或捐贈給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如陳介祺的《簠齋存古餘錄》拓本集十冊。不論是菲爾德博物館，還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來自李宗侗的藏品均可視為名碑善本。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李氏藏品信息，參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碑帖》，〈序〉，頁2-3。

²¹ 閻長麗，〈端方研究綜述〉，《滿族研究》2009.2：43。

²² 參見尚小明，《學人遊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165-169。按：尚氏指出端方幕僚中有不少精通或喜好金石碑版之學，在幕僚襄助下，端方才能刊行《陶齋藏石記》、《陶齋藏板記》、《陶齋吉金錄》、《陶齋吉金續錄》、《壬寅銷夏錄》等著作。

²³ 潘崇，〈清末端方的古物收藏及藏品著述〉，《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7：128-134。

²⁴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鑒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4），〈端忠愍精鑒碑版〉，頁4456。按：此條資料出自端方幕僚張祖翼所撰《清代野記》，參見賴鈺鈺著，《端方與晚清展示文化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84。

²⁵ 王國維著，謝維揚、莊輝明、黃愛梅分卷主編，《觀堂集林》（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卷八），頁639-640。按：詩作於一九一二年。王氏似因羅振玉而與端方有交往，故得以觀覽端方藏品。周光午寫道：「先生又以與滿人端方及江陰繆藝風因緣至密，因得遍覽古今

方「寶華庵（盦）」源於漢西嶽華山廟碑，世間僅存之長垣本、華陰本及四明本，悉歸其所有，故名；²⁶乾嘉著名金石學者黃易藏品〈漢魏五碑〉，後悉歸端方；²⁷道光年間出土的西周重器毛公鼎，曾歸端方所有，為衆人所知；故宮、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圖書館等機構所藏碑拓精品，不少亦是端方舊藏，如〈曹真殘碑〉（故宮）、〈長垣本華山廟碑〉（中國國家圖書館）、〈劉熊碑〉、〈且渠安周造寺碑〉（中國國家博物館）、〈崔敬邕墓誌〉（上海圖書館）……。

端方本人精鑒賞，周圍又有衆多精鑒之人，如楊守敬、李葆恂、王瓘、王仁俊、況周頤、費念慈、楊鍾義、張祖翼、褚德儀（後避溥儀諱而改為德彝）、屠寄等等。陳衍曾言：「湖北巡撫端方喜搜求金石，非經守敬與義州李葆恂審定，則不敢信。」²⁸楊守敬擅輿地、金石、目錄學，「以淹通宏博，善考證，精鑒別，及工隸草諸體書，係海內外之望，數十年巋然為東南大師」；²⁹李葆恂被端方歎為「錢竹汀後一人也」，³⁰時人稱其「金石書畫精鑒獨真，世推為北學第一」。³¹較之楊、李，褚德儀、王瓘算是後起之秀。對於褚氏「雖強識博物如猛庵（李葆恂曾號猛庵），亦未嘗不以為可畏也」；對於王氏「考釋金文亦最精確，足與猛庵相埒也」。³²此外，繆荃孫、王闓運等知名學者，亦對端方藏品有所品鑒。筆者調閱的七件端方舊藏，多數有楊守敬、王闓運等人題跋。楊守敬題跋時間均署為「光緒丁未三月」，與今所見《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書跋時間同；「質之甸公」、「光緒丁未三月楊守敬書于金陵節署」等語，³³可表明此年楊

圖籍及陶齋所藏金石。」周曾在清華研究院任助理員，又云：「余不習王先生之學，然頗知王先生之為人。」如此，成就王國維學術者，除通常所提羅振玉、繆荃孫外，端方恐亦無法忽略。參見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國維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王國維全集·附錄》卷二〇，頁284、286；王氏與端方交往事，又參見賴鈺勾，〈端方與晚清展示文化研究〉，頁114-115。

²⁶ 李葆恂，《舊學盦筆記》（收入《義州李氏叢刻七種》〔李放京師刊本（1916）〕，頁17正；徐珂編撰，《清稗類鈔·鑒賞類》，〈端忠愍藏漢西嶽華山廟碑拓〉，頁4457。按：〈漢西嶽華山廟碑〉，除上所述三本外，尚有順德本（金農舊藏，後歸順德人李文田），但罕為人知。關於諸拓本情形，參見張彥生，《善本碑帖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4；方若著，王壯弘增補，《增補校碑隨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修訂本），頁53-54；仲威，《中國碑帖鑒別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65-66。下文提及現存拓本的一般情形及年代鑒定依據，均引自以上三書，不另行出注。

²⁷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鑒賞類》，〈端忠愍藏漢碑拓〉，頁4457；故宮博物院編，《蓬萊宿約：故宮藏黃易漢魏碑刻特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106-123。

²⁸ 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588。

²⁹ 陳三立，李開軍校點，《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967。

³⁰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頁965。

³¹ 吳重憲，〈序〉，李葆恂，《舊學盦筆記》。

³² 楊鍾義，〈序〉，褚德彝（德儀）述，《金石學錄續補》（餘杭：褚氏石畫樓印聚珍排印本，1919），頁30背。

³³ 楊先梅輯，劉信芳校注，《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成都：巴蜀書社，1996），頁25、63。按：據楊守敬自述《鄰蘇老人年譜》，可知其集中為端方藏品題跋有兩次，即光緒丙午（1906）、宣統己酉（1909）。不過，楊氏自述丙午年事恐誤。楊氏自述：「三月，兩江總督端午橋招余至金陵署中，題跋所藏金石碑版。」事實上，一九〇五年底，端方等人出洋考察憲政，於一九〇六年七月始返抵上海，顯然無法招楊氏題跋碑版，端方被任命為兩江總督是在此年九月。如此，《年譜》中的丙午年題跋事，看來應是次年（丁未年，1907）之誤。參見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第1冊，頁23-24；考察憲政事，參見張海林，《端方與清末新政》（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04-141。

氏爲端方不少藏品題跋。王闓運書跋時間是光緒癸卯（1903），與其日記、年譜所載契合。³⁴

從《拓本聚瑛》來看，經端方、李宗侗遞藏的藏品約十種：〈舊拓琅琊臺碑〉（菲爾德編號 233919）、〈端方集藏秦漢石舊拓三種〉（編號 233917a-c）、〈漢征羌侯張君殘碑〉（編號 233921）、〈舊拓漢殘碑四種〉（編號 233922）、〈群臣上壽刻石〉（編號 233917-b）、〈孔宙碑〉（編號 233915）、〈孔宙碑陰〉（編號 233916）、〈韓仁銘〉（編號 233924）、〈校官碑〉（編號 233920）、〈秦鄧太尉祠碑〉（編號 233918）。與端方相關者三種：〈曹真殘碑〉（編號 244496/1）及〈碑陰〉（編號 244497/1）、〈陶齋舊藏古禁全器〉（編號 245576）；與李氏相關者一種，即宋本〈蘭亭序〉（編號 233914）。端方恐怕沒有想到，時過境遷，舊藏竟入藏於自己出洋考察憲政且曾駐足的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³⁵若地下有知，他大概也同今人一般，會感歎冥冥之緣吧。

二、館藏秦漢碑拓精華簡介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全天（當地時間），受人類學部藏品經理 Jamie Kelly 熱情接待，筆者有幸調閱並翻拍大部分端方舊藏；現就調閱的秦漢拓本情況、書跋及鑒賞印章等，逐一略做介紹。³⁶（圖三至圖九、圖一三、圖一五；所附拓本照片，均獲得菲爾德博物館授權。）



圖三：筆者調閱的部分端方舊藏（作者攝於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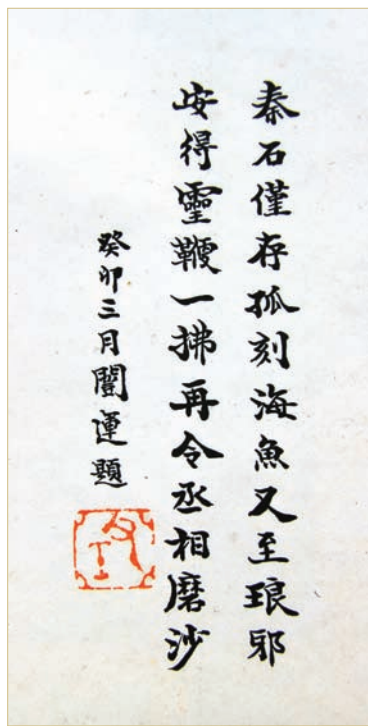
³⁴ 王代功述，《清王湘綺先生閻運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230；王闓運，《湘綺樓日記》（臺北：學生書局，1985），頁783-784。按：《年譜》記載，光緒癸卯三月，「巡撫端公迎入府署，請鑒所藏碑帖數百本。」

³⁵ 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九日，端方參觀菲爾德博物館，並參加館方慈善晚會。端方曾贈送一唐代造像給菲爾德博物館，並親自題記。參見賴鈺勾，《端方與晚清展示文化研究》，頁65, 137。

³⁶ 書跋釋文輯錄凡例如下：跋文中原有的闕字符號□照錄；未辨識文字，剪貼原字，以備考釋，少數古字亦剪貼之；跋文注釋以「原注」加以標識，並置於括弧（）內；跋文引文闕字或別字，加中括弧〔〕以示區

〈舊拓琅琊臺碑〉

紙本墨拓，篆書，剪裱，縱 44.4 釐米，橫 27.6 釐米。李葆恂題簽「舊拓琅琊臺碑」，署「戒堪」，鈐「文石父」（朱文）；內又有張祖翼署題「秦琅琊臺碑」，鈐「磊龕」（白文）；另有舊題「秦瑯邪碑」。附有縮印本「琅琊臺碑」一紙。鈐有「高陽李宗侗印」（白文）、「張孝達讀碑記」（朱文）、「蔭綠軒書畫印」（朱文）、「生齋臺灣行篋記」（朱文）、「李」（朱文）等鑒賞印。有張之洞（鈐「壺公」，白文）、王闓運（鈐「壬父」，朱文）、鄭孝胥（鈐「海藏樓」，朱文）、褚德儀（鈐「褚儀」，白文）、李葆恂（鈐「文石父」，朱文）、寶巽、俞廉三（鈐「小臣廉」，白文）、章鈺（鈐「章鈺日利」，白文）、張祖翼（鈐「海外歸來」，白文）、震鈞（鈐「震鈞」，朱白文）、屠寄（鈐「屠寄之印」，白文）等人觀款或題跋。或略記觀賞之事，如「癸卯春日，俞廉三觀于武昌舟次」；或著眼於書法，如震鈞「此篆結構精緊，行筆適麗，信非上蔡不辦，宜乎完白山人祖為不洮而寢饋之也」；或校釋文字，指正謬誤，如章鈺「石本『請具刻詔書』下，校史文多一『金』字」；⁴⁷或慨歎秦石難得，如王闓運「秦石僅存孤刻，海魚又至琅邪，安得靈鞭一拂，再令丞相磨沙」。（圖四）琅琊臺碑全拓本十三行八十六字，傳世本多為九行或十一行。此本為十一行本，缺首行「五大夫趙嬰」、末行「制曰可」。第七行「之」字尚全，第八行「德」字清晰，為舊拓本無疑。此石為秦二世元年刻石，如屠寄所言：「五大夫楊樛以上，當有始皇帝原文及其他從臣之名，不知何代斷泐」，但不能因此而視之為始皇二十八年刻石。與阮元全拓相比，此本雖說不完整，但椎拓甚精，故李葆恂、張祖翼、震鈞、屠寄讚賞有加。李葆恂寫道：「此本楮墨古厚，當是國初氈蠟，較阮本似為過之」；屠寄則言：「是拓淡薄如蟬翼，氈椎之精，所見殆罕。」清末或訛傳此石為寺僧沉諸於海，或傳碑石經海水衝突而崩落海中。實則，原石今存中國國家博物館；民國初年王景祥尋訪此碑，刻石述其尋訪經歷，刻石今存山東省博物館。



圖四：王闓運〈琅琊臺碑〉跋
（作者攝於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

分；通假字、異體字等，均以常用字代替，不另行說明（拓本題跋之外的通假字或異體字，不強行統一）。相關題跋輯錄，參見拙篇〈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藏秦漢碑拓七種題跋輯錄〉，《國學學刊》2013.2：60-70。

⁴⁷ 阮元曾言：「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少異」，故章鈺有此校語。按：《史記》寫作「請具刻詔書刻石」，石本作「請具刻詔書金石刻」，不僅多一「金」字，文句亦略異。參見阮元著，鄧經元點校，《寧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頁 643；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紀〉，頁 267。

〈泰山都尉孔宙碑〉

紙本墨拓，隸書，剪裱，縱 43.1 釐米，橫 27.5 釐米。褚德儀題簽「漢泰山都尉孔宙碑」，署「褚儀」，有識語「高字未壞本」；內有舊題簽「漢孔宙碑」，鈐「思園珍藏」（白文），有「漢延熹七年刻石」識語。鈐有「小詒硯齋」（朱文）、「曾氏荃巢」（朱文）、「畏人嫌我真」（白文）、「見跡如真」（白文；此印釋文存疑）、「高陽李宗侗印」（白文）、「雷氏拙軒」（朱文）、「梧亭」（朱文）、「李玄伯」（白文）、「寧丞眼福」（朱文）等鑒賞印，少數印章不止出現一次。有楊守敬（鈐「楊守敬印」、「星吾審定」，白文）、張之洞（鈐「壺公」，白文）、胡玉縉（鈐「縉印」，白文）、王闓運（鈐「壬甫」，朱文）、端方（鈐「端方私印」，白文）、張祖翼（鈐「磊齋審定金石」，朱文）、李葆恂（鈐「戒龕」、「義州」，朱文）、褚德儀（鈐「褚儀」，白文）、鄧嘉績（鈐「江甯鄧嘉績印」，白文）、鄧邦述（鈐「鄧七」，朱文）、俞廉三（鈐「中禹父」，朱文）、王仁東、屠寄（鈐「屠寄私印」，白文）諸人觀款或題跋。或據此碑論漢代經學流派，如胡玉縉，詳下；或據碑文、史文考訂史實，如張祖翼、李葆恂。題跋中亦多論及拓本年代。二行「少習家訓」之「訓」字「川」部中豎末端未與下石花連，九行「凡百印高」之「高」字完全，十行「其辭曰」之「辭」字略泐損，據此可判定為明中期或更早之拓本。美中不足的是，此本十四行「屢省乃聽」、「恭儉自終」兩句，剪裱時銜接有誤，文句不連，同行「歿垂令名」句又不存。楊守敬、胡玉縉、王闓運、李葆恂、褚德儀、鄧邦述、端方均審定為宋拓。端方寫道：「『凡百印高』，高字『門』宛然尚存，所見明拓極舊本皆已泐蝕。故王文敏公定此為宋拓，蓋灼然有見也。」（圖五）無獨有偶，《清稗類鈔》亦略述此拓：「宋拓〈孔宙碑〉為端忠愍藏，『高』字未壞本也。碑陰舊拓，多軼『故民』二字，尤為他碑陰所無，為宋拓真本。」³⁸不過，張祖翼審定為明初本：「是拓墨光如漆，時發古香。『高』字、『辭』字皆未泐，其為五百年前蠟蠟無疑。」（圖六）其跋書於一九〇八年，年代後於諸人。究竟為何時拓本，有待進一步研究。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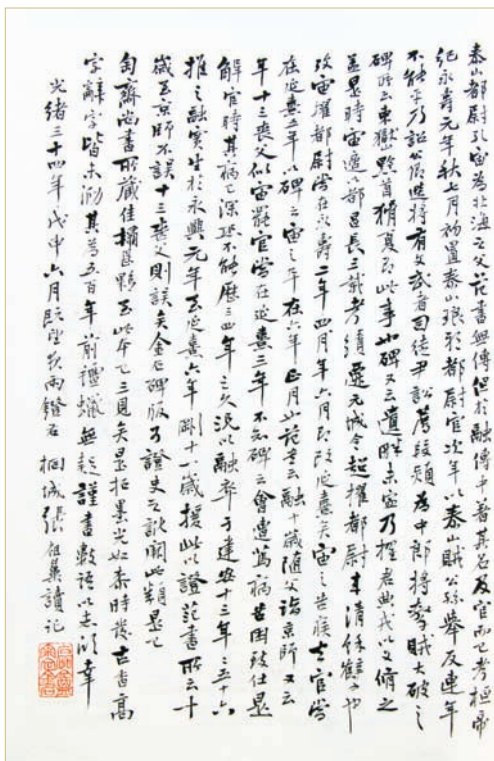
圖五：端方〈孔宙碑〉跋

³⁸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鑒賞類》，〈端忠愍藏宋拓漢孔宙碑〉，頁 4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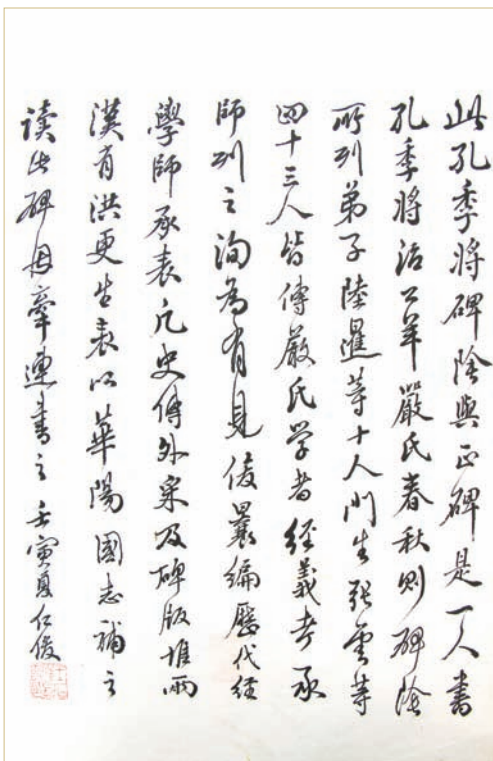
³⁹ 或以為據「高」字下「口」字與泐痕不相連定為宋拓，非也。參見羅振玉著，《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收入羅繼祖主編，王同策副主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七集），頁

〈孔宙碑陰〉

紙本墨拓，隸書，剪裱，縱 44.3 釐米，橫 27.5 釐米。費念慈題簽「孔宙碑陰」，署「西齋」，鈐「杞懷」（朱文）；張祖翼補臨碑陰「門生故吏名」，鈐「張祖翼」、「磊齋」（白文）。鈐有「張孝達讀碑記」（朱文）鑒賞章一方。有王瓘（鈐「王瓘私印」，白文；「孝玉」，朱文）、胡玉縉（鈐「縉印」，白文）、楊守敬（鈐「楊守敬印」、「星吾審定」，白文）、俞廉三（鈐「廉三印」，白文）、李葆恂（鈐「文石」、「義州」，朱文）、李佳繼昌、褚德儀（鈐「褚儀」，白文）、瞿廷韶（鈐「廷韶印信」，朱文）、王仁俊（鈐「王仁俊長壽印」，朱文）、張祖翼（鈐「磊齋審定金石」，朱文）、屠寄（鈐「屠寄之印」，白文）諸人題跋。題跋多圍繞碑陽、碑陰是否為一人所書展開。胡玉縉寫道：「孔宙碑陰書法，視正碑為謹嚴。牛階平云如螻蟻蟠屈，深冬自衛，似別出一手。翁蘇齋亦以偏旁點畫比較，以為兩人書，其說良確，不得以他碑陰往往與正碑同出一手而強以相例也。」實際上，早於牛運震、翁方綱，顧炎武即有類似看法：「視同前碑微異，當別是一手」。¹³⁵ 李葆恂、王仁俊、張祖翼則認為同出一手（圖七）。李葆恂以為：「此碑正碑縱逸、陰適麗，並為漢刻之極則，然自是一手變體為之」，張祖翼以



圖六：張祖翼〈孔宙碑〉跋



圖七：王仁俊〈孔宙碑陰〉跋

135. 又，關於清人對精拓如宋拓的追求，參見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頁 90-101。

¹⁴⁰ 顧炎武輯，《金石文字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初刻本年代不詳〕，第一輯，第 12 冊），卷一，〈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並陰〉，頁 16 正-17 正。

爲：「陰與前碑筆勢似異而實同」。是否如此，尙未有定論。孔宙碑陰尙有篆額，在漢碑中極爲罕見。碑陰舊本多軼而未拓，楊守敬、張祖翼、王瓘審定此本爲明拓。

〈舊拓漢聞熹長韓仁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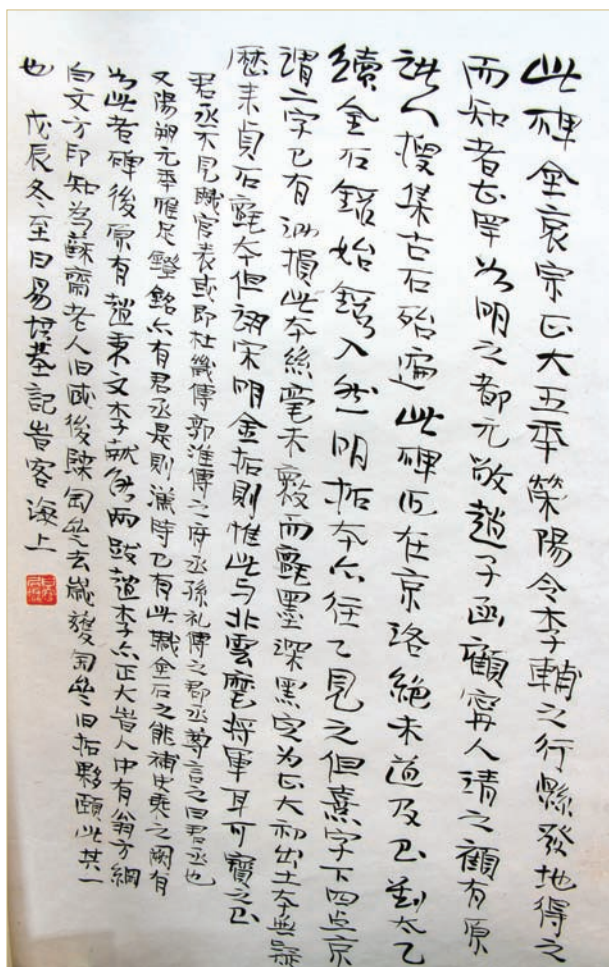
紙本墨拓，隸書，剪裱，縱 44.3 釐米，橫 27.6 釐米。張之洞題簽「舊拓漢聞熹長韓仁銘」，署「壺公署簽」，鈐「臣張之洞」（白文）；內又有張祖翼題簽「漢聞熹長韓仁銘」，鈐「張」（朱文）。鈐有「仲恭審定」（朱文）、「黃孝度」（白文）、「翁方綱」（白文）、「張孝達讀碑記」（朱文）等鑒賞印。有易培基（鈐「白宮居攝」，白文）、張之洞（鈐「壺公」，白文）、王瓘（鈐「王瓘之印」，白文；「孝玉」，朱文）、王闓運（鈐「壬甫」，朱文）、李葆恂（鈐「義州」、「文石父」、「默公審釋金石文字記」，朱文）、張祖翼（鈐「張祖翼」，白文；「遜先讀碑」，朱文）、楊鍾羲（鈐「楊氏子勤」，朱文）、俞廉三（鈐「中禹父」，朱文）、劉心源（鈐「劉押」，朱文）、王仁東、楊守敬（鈐「楊守敬印」、「星吾審定」，白文）、吳廣霈（鈐「劍華道人」，朱文）等人題跋。題跋所論集中於四點。一則，此碑發現、著錄之事，易培基、劉心源論及之；二則，文體迥異，全用公牘，張祖翼論之；三則，職官、句讀及文字寫法，易培基、王闓運、吳廣霈稍帶論及；四則，拓本年代，易培基、李葆恂、張祖翼等均論及之。今僅就拓本年代略述諸人看法。王瓘、俞廉三視爲「舊本」、「舊拓」而未言明年代，李葆恂定爲「明中葉所拓」，張祖翼則稱「明初拓本」，吳廣霈「疑是初出土時不久之拓本」，易培基認爲是金代拓本：「然明拓本亦往往見之，但熹字下四點，『京』、『謂』二字已有泐損，此本絲毫未壞而氈墨深黑，定爲正大初出土本無疑。」（圖八）「熹」、「京」、「謂」確是判定拓本年代的重要依據；第四行之「爲」字，第五行之「少」字，亦均未損，定爲明拓本應無可疑，是否爲初出土拓本，有待方家審定。此外，易氏還說道：「去歲獲匄齋舊拓夥頤，此其一也」（題跋寫於戊辰冬至日，即一九二八年），則其獲端方舊拓是在一九二七年，無形中爲考察端方藏品流向提供了重要線索。^④

〈漢校官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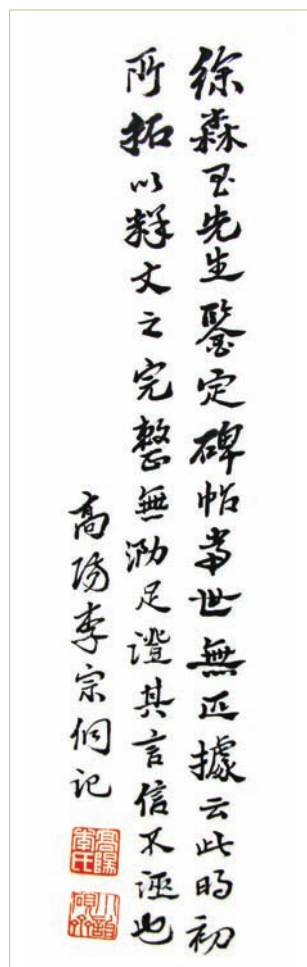
紙本墨拓，隸書，剪裱，縱 44.2 釐米，橫 27.6 釐米。張之洞題簽「漢校官之碑」，署「張之洞」，鈐「壺公」（白文），並有「匄齋藏明拓本」識語；另有張在辛舊題簽「漢校官碑」，鈐「張在辛」、「卯君」（白文），有「光緒四年釋文附」識語。另附元朝

④ 從賴鈺勾學位論文中提到的《造像各種石刻目：陶齋原藏》一書看，一九二七年恐是端方藏品流散的關鍵年份，這恰與易培基所獲端方舊藏年代相合。參見賴鈺勾，《端方與晚清展示文化研究》，頁 133-135。民國初期，端方後人曾有意將部分藏品出售政府，未果，以至於其藏品大規模流散。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選編，〈北洋政府收購端方所藏文物有關文件〉，《民國檔案》1995.2：3-5。又，關於端方藏品流散海外的情況，羅振玉曾有記述，參見羅振玉著，《海外吉金錄》，收入《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六集》，頁 661-678。

單禧〈校官碑釋文〉拓本。有「高陽李宗侗印」（白文）、「張孝達讀碑記」（朱文）、「仲恭審定」（朱文）、「生齋臺灣行篋記」（朱文）等鑒賞印，或不止一次出現。有王瓘（鈐「王瓘之印」、「樂此軒」，朱文；「孝禹」，白文）、沈邦憲（鈐「幼彥」，朱文；「沈」，白文）、張之洞（鈐「孝達審定」，朱文）、王闓運（鈐「壬甫」，朱文）、鄭孝胥（鈐「海藏樓」，朱文）、李宗侗（鈐「高陽李氏」，白文；「小詒硯齋」，朱文）、李葆恂（鈐「義州」、「默公審釋金石文字記」，朱文）、劉心源（鈐「劉押」，朱文）、金蓉鏡（鈐「閻伯讀碑記」，朱文）、俞廉三（鈐「俞廉三」，朱文）、張祖翼（鈐「磊齋審定金石」，朱文）諸人題跋或觀款。題跋多討論拓本年代，兼論及其他，如發現過程、釋文、書法等等。是拓爲清初張在辛舊藏，後歸端方。故如李葆恂所言：「自是明季國初舊本」。張之洞、王瓘、沈邦憲、李宗侗、金蓉鏡諸人看法與李氏同。李宗侗引徐森玉語記曰：「徐森玉先生鑒定碑帖當世無匹。據云此明初所拓，以釋文之完整無泐，足證其言信不誣也。」（圖九）末行「光和四年」四字，如王瓘所言：「清朗特甚」，應爲明拓。拓本精良，單禧釋文亦善，可補《隸釋》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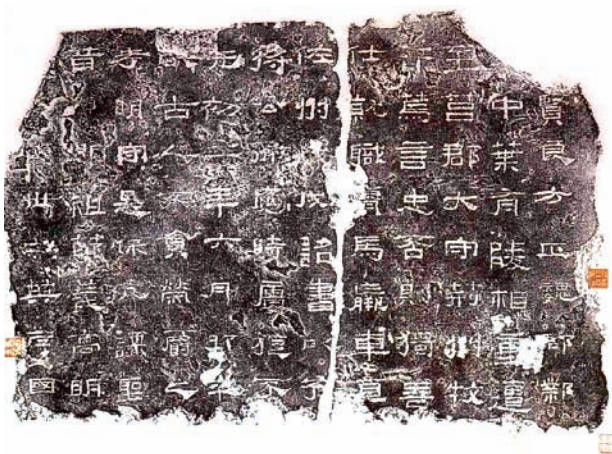
圖八：易培基〈韓仁銘〉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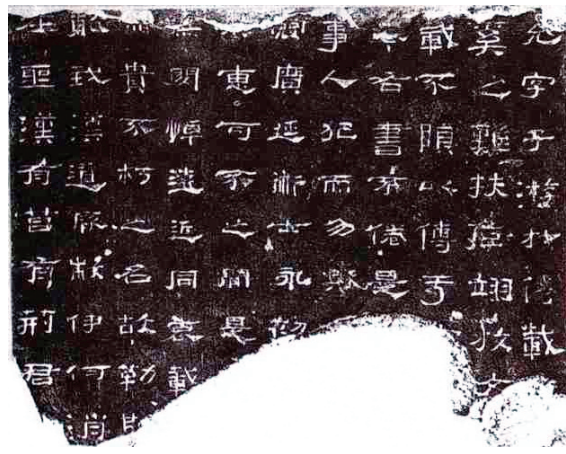
圖九：李宗侗〈校官碑〉跋

〈舊拓漢殘碑四種〉

紙本墨拓，隸書，剪裱，縱 44.4 釐米，橫 27.6 釐米。李葆恂題簽「舊拓漢殘碑」，題四殘碑之名「劉君、正直、子游、元孫」，署「戒龕」，鈐「戒龕」（朱文）；題簽下又有王闓運觀款：「闓運曾觀，癸卯」，鈐「壬甫」（朱文）；封內又有題簽「漢殘碑四種」，鈐「裴齋」、「白華山房」（朱文）。此拓遞為顏逢甲、莊縉度（莊氏字眉叔，號裴齋，此拓莊氏印章屢見）收藏，可能也曾為黃易收藏（黃易字小松，以「小蓬萊閣」為齋名，此拓中「小蓬萊閣」鈐印凡四見），⁴²後又經端方、李宗侗遞藏。每一殘碑拓本前，均有題簽，書寫碑名，多鈐「裴齋」（朱文）；〈劉君殘碑〉則鈐「金沙鶴水」（朱文）。每拓本末又有莊氏跋語，敘述殘石發現時情形，兼論及書法，多鈐「裴齋鑒賞」（朱文）；〈劉君殘碑〉兼鈐「眉叔」（白文）；〈子游殘碑〉（圖一〇、圖一一）兼鈐「天水莊生」（朱文）。⁴³每一殘碑拓中所鈐鑒賞章多同，或不止一次出現，計有「白華山房」（朱文）、「滕顏逢甲」（朱文）、「眉叔所藏金石」（白文）、「眉叔」（白文）、「天水莊生」（朱文）、「山野人」（朱文）、「江氏金石」（白文）、「侯汝承讀碑記」（朱文）、「茂肅」（白文）、「裴齋鑒賞」（朱文）、「莊氏」（朱文）、「小蓬



圖一〇：〈賢良方正殘石〉（為〈子游殘碑〉上半部分）
（引自《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商周至秦漢書法》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頁185）



圖一一：〈子游殘碑〉
（引自《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商周至秦漢書法》，
頁179）

⁴² 莊縉度「藏碑拓甚富，黃小松、李東橋所藏漢碑舊拓本，皆歸之，著有《裴齋碑目》，參見諸德彝（德儀），《金石學錄續補》，頁7正；關於黃、莊所藏金石拓本，黃氏舊藏後歸莊氏等事，參見謝國楨，〈記黃易與莊縉度之藏漢魏碑刻〉，《社會科學戰線》1980.3：223-226。

⁴³ 莊氏就〈子游殘碑〉頗有見地地指出：「此碑及劉君、元孫、正直碑，凡大小五石……計斷石尚有沈埋土中者。」民國初年，〈子游殘碑〉上截出土，即通常所說的「賢良方正」殘石，兩者正為原碑之上下截，中間缺字亦少。莊氏還特別指出，「是碑純用渴筆，漢石僅見。」莊氏跋〈元孫殘碑〉云：「元孫一石棄置西門君祠墻田間，書之秀蘊當奉為神品。」〈子游殘碑〉綴合，參見劉承幹撰，《希古樓金石萃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卷七，〈漢賢良方正殘石〉，頁4背-5背。

萊閣」(朱文)、「之洞審定」(朱文)、「亦字東田」(朱文)、「太原」(朱文)、「黃雁山樵臨津漁父」(朱文)、「江氏金石」(白文)、「意園讀碑」(白文)、「農官大夫」(朱文)、「侯汝承觀」(白文)、「南蘭莊氏眉叔曾鑒見」(朱文)、「鍾廣信璽」(白文)、「默公審釋金石文字記」(朱文)、「文梯拜觀」(朱文)等鑒賞印。拓本前後又有王仁俊(鈐「扞鄭三十以後作」、「捍鄭考藏金石文字」,朱文)、張之洞(鈐「臣張之洞」,白文;「壺公」,朱文)、顏逢甲(鈐「白華山房」、「滕顏逢甲」,朱文)、吳廣需(鈐「吳廣需印」,白文)、楊守敬(鈐「楊守敬印」、「星吾審定」,白文)、震鈞、楊鍾羲(鈐「雪泥鴻踏」,白文)、寶熙及沈曾桐(鈐「沈叔子審定金石印記」,朱文)、李葆恂(鈐「戒堪」,朱文)、胡鼎彝、俞廉三(鈐「廉三」,白文;「中隅」,朱文)、金蓉鏡(鈐「金蓉鏡印」,白文)、王仁東、張祖翼(鈐「遜先讀碑」,朱文)等題跋。或考釋各殘碑文字,如王仁俊、吳廣需,且王氏論之最詳;或據碑文論及今古文經,如俞廉三;或敘諸石存字數量、情形,如顏逢甲、張祖翼;或就劉君殘碑末「歲在辛酉」幾字的字形、結構立論,如莊縉度、王仁俊、吳廣需認為其與正碑文字有別,似亦非碑側刻字。四殘碑發現於嘉慶三年(1798),拓本為舊拓或初拓,文字保存亦完好,故張祖翼慨歎「舊拓之至可貴也」。

〈漢征羌侯張君殘碑〉

紙本墨拓,隸書,剪裱,縱 44.3 釐米,橫 27 釐米。王仁俊題簽「漢征羌侯張君殘碑」,有「闕石堪主藏石,光緒壬寅夏王仁俊拜署」識語,鈐「扞鄭三十以後作」(朱文);封內有張祖翼題「張君殘碑」,有「闕石堪藏石,張祖翼題」,鈐「磊龢」(白文)。鈐有「高陽李宗侗印」(白文)、「泉彬寓目」(白文)、「仁俊審定金石文字」(白文)等鑒賞章。有王瓘(鈐「王瓘私印」、「孝禹」,白文)、楊守敬(鈐「楊守敬印」、「星吾審定」,白文)、張祖翼(鈐「磊龢審定金石」,朱文)、李葆恂(鈐「默公審釋金石文字記」、「文石父」,朱文)、王闓運(鈐「壬父」,朱文)、俞廉三(鈐「廉」,白文)、金蓉鏡(鈐「鏡」,朱文)、張之洞(鈐「之洞審定」,朱文)、鄧邦述(鈐「正閭題記」,朱文)、褚德儀(鈐「褚儀」,白文)、寶熙及沈曾桐(鈐「吳興叔子」,朱文)、鄧嘉縝(鈐「江甯鄧嘉縝印」,白文)、李翰芬(鈐「守一」,朱文)、吳廣需(鈐「劍華」,朱文)、王仁俊(鈐「籀許」,白文)等人題跋或觀款。審定殘碑年代是諸人關注焦點之一。從字體立論者,如王瓘、李葆恂,定為曹魏時物,碑主為《三國志》所載張既之兄,但金蓉鏡指出此說之矛盾處:「惟〈張既傳〉小子翁歸爵關內侯,子緝嗣西鄉侯,緝乃無兄;既世單家,又無昆弟,可以附證或翁歸即其兄,然先已封侯,與所敘官閥亦不合意。史文有奪誤歟?」張祖翼審慎推論:「恐是魏晉時物」,楊守敬則言:「是漢是魏,皆未審當,當再考之」。王仁俊定為漢碑,千六百餘字之考證,考釋碑主為漢末張敬之兄,堪稱精詳;吳廣需結合王氏考證,兼及字體,

亦定為漢碑。題跋或兼論及碑主履歷、文字考釋等等，不一而足。此石晚清出土，後為端方所得，被譽為「陶齋所藏漢石之冠」，⁴⁴並收入《陶齋藏石記》。《陶齋藏石記》所引吳士鑒題跋，省去張君殘石數量之記載，即出土時「凡四石」，除端方所藏一石外，「其三石則不知所歸」。⁴⁵七十年後，馬子雲綴合此碑殘拓，使之近乎完璧（圖一二），⁴⁶與吳士鑒所載殘石數大體吻合。

以上，是對部分端方舊藏情況的介紹，點評諸碑書法藝術之語多從省。今所見名碑善帖叢刊，多著眼於書法藝術，較少從歷史角度立論，拓本書跋亦罕刊錄。書法非筆者所能論，故從歷史入手，僅就題跋所見諸問題，進一步展開討論。

三、題跋所見重要問題

以貞石來考證歷史，為金石學家之能事，自歐陽修、趙明誠開其端緒，至洪适而體例臻善，錄文、考證兼備。後之學者，或不作錄文，僅撰述跋尾，以為考證。題跋存於文集者，易於找尋；直接書於金石拓本或書畫上，則難覓見。雖有善本題跋輯錄之陸續出版，⁴⁷其價值亦為學者肯定，⁴⁸但關注者寥寥。善本古籍（也包括拓本）手書題跋或題記的價值，可著重強調者有三：補文集之闕；存學術之跡；窺見士人生活、交際之一斑。就上述諸拓本題跋而言，較重要問題約略有四：文字釋讀、句讀及古文寫法；碑文所見漢代今古文經學；藉碑文以考證史實，兼論地理、職官；題跋與士人之生活、交際網絡；下依次簡略述之。

（一）文字釋讀、句讀及古文寫法

秦漢碑碣多殘斷，文字剝蝕難辨。〈舊拓漢殘碑四種〉釋文，今人多從武億、王昶。文字磨泐不清者，摹勒字形而不釋。王仁俊就「前人所未釋者」而釋之。〈劉君

⁴⁴ 褚德彝（德儀），《金石學錄續補·附錄》，頁5正。

⁴⁵ 吳士鑒，《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編》（宣統二年刻本〔1910〕），頁25正。按：一般認為此石一九〇〇（庚子）年出土於河南，但吳士鑒題跋書於光緒辛卯十二月，即西元一八九一年末或一八九二年初，則殘石出土約在光緒辛卯或此前。吳氏張君殘碑跋有二，第二跋中有言：「光緒庚寅辛卯間，端忠敏得魏西鄉侯兄殘碑」。若吳氏所言可信，則端方獲此殘石時間，約在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一年間。如此，恰與第一跋時間相合。學界通常注意《陶齋藏石記》所錄吳氏第一〈跋〉而忽略第二〈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至第四輯亦未收錄此書。參見吳士鑒，《九鐘精舍金石跋尾乙編》（宣統二年刻本〔1910〕），頁4背-5背。

⁴⁶ 馬子雲，〈關於〈漢池陽令張君碑〉殘碑〉，《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1：83-85。

⁴⁷ 參見王敏輯注，《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標點善本題跋集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2）。

⁴⁸ 參見湯蔓媛，〈敘論：天祿琳琅外一章〉，湯蔓媛纂輯，《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臺北：中央研究院，2008），頁21-41。



漢池陽令張君殘碑

圖一二：馬子雲綴合《漢池陽令張君殘碑》

(引自《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商周至秦漢書法》，頁192)

殘碑》中，「國之裔兮」一句，武億釋為「裔」字，並推論碑主劉姓；《金石萃編》迻錄，並錄瞿中溶跋，今人多從。王仁俊、吳廣霈認為《萃編》所引不可通，「裔」字乃是「寶」字的誤釋。王氏還指出，此句與「『簡□帝心』，文義亦接，並推得下行『為國之□』，疑即『楨』，與『心』韻也。」按：「帝」字今人多不釋，從殘存筆劃看可能如此；若誠為「帝」字，則上缺字恐為「在」，即「簡在帝心」，文意正通。至於「楨」字，字跡全無，闕疑不釋。〈子游殘碑〉中的「**右**書不倦」，王氏以為「蓋著書不倦」，「與下『犯而勿欺』，一表其學，一表其行」，吳廣霈亦持此說。〈正直殘碑〉中，王氏以為：「『考』上確是『祖』字，『喪』上是『稱家』二字，『右守』上右旁確是『崑』字……『**竅**」字乃『覈』之省，觀下『部職』二字可知非『**竅**』字矣。末行『友信』，『友』字尚析，然『孝信』也。」按：「祖」字殆可無疑，「稱家」之「家」、「友信」似亦可從；「家」上之字存疑，「**竅**」字今人釋文作「覈」恐誤。〈元孫殘碑〉中，王氏以為：「『遺孤奉承』下字疑『風』字，當是『風紀』，『和一人』下字劇細，細審乃『兮』字」，而吳廣霈認為「『奉承』下三半字則未敢定，末行首一字似『有』字」。按：端方此本為初拓或舊拓，文字較後來拓本清晰不少，王氏所釋「風紀」、「兮」字，吳氏猜測之「有」字，可備一說。

〈漢征羌侯張君殘碑〉中，末行字多不完，王仁俊以為：「第十行剩字似『辟命不應』，末二殘字似『春秋』字……四行當是『敦書悅樂』，六行當是『高唱寡和』，八行當是『刑罰折中』，尚可以文義讀之也」。以上諸字，文義均通；結合馬子雲綴合殘石，可證王說不誣。李葆恂補「換斥□」所闕字為「章」（或疑為「邱」），鄧邦述補「除夷陵侯」下闕字為「相」，金蓉鏡以為「遷池□」下闕字或是「陽」，似均可信從。

漢碑中的古文或通假，素為小學考證的寶貴材料，且不少又與經義相關連。比如，〈正直殘碑〉中「其辭曰」的「其」字作「**元**」，係古字，武億已指出此點，王仁俊承繼之，又引「韓勅碑陰」題名證之，還指出《玉篇》：「**元**」字古文，蓋本諸於漢碑。其餘拓本所見古字，主要見於〈校官碑〉、〈韓仁銘〉、〈孔宙碑〉。〈校官碑〉中，沈邦憲以為「賢」作「**取**」、「智」作「**智**」、「責」作「**責**」、「邊」作「**邊**」，皆古文；〈韓仁銘〉中，吳廣霈以為「牢」作「**牢**」，與〈史晨碑〉同，「**𠂔**」即「不」，「**𠂔**」即「短」，皆隸變通假。前人或已述之，不贅。⁴⁹〈孔宙碑〉所見今古文尤多，多涉及漢代今古文經學，詳下，此亦不贅。

⁴⁹ 洪适，《隸釋》（與《隸續》合訂，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頁20；吳玉搢，《金石存》（嘉慶二十四年聞妙香室校刊本〔1819〕），卷七，〈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頁2正；卷八，〈漢聞熹長韓仁銘〉，頁18背-19正；卷九，〈漢校官碑〉，頁2背-3正。按：《金石存》一書不見於《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至四輯。

句讀方面的事例不多，或與經學相關，主要見於〈正直殘碑〉。俞廉三引武億說：「正直是以」連讀，「以」即「與」，引《詩》、《儀禮》證之，並指出碑所據古文，《詩》所謂「與」者今文。按：今多將「正直」上讀，「是以」下讀，即「是以揚名於州里」。能否據此判定武、俞之說有誤，當下似亦無堅實例證。此碑殘存文字有限，若碑文有韻，則武、俞之說未必不可信從，姑存之，待考。

（二）碑文所見漢代今古文經學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經學漸盛，經文稱引屢見諸於漢碑。欲解碑文之意，自是不能舍經，故有皮錫瑞《漢碑引經考》等書。不過，此批拓本題跋所見漢代經學，書寫年代早於或與皮氏同時，且又有諸人未曾留意者。今以〈孔宙碑〉、〈漢征羌侯張君殘碑〉為例，先逐錄跋文（節錄），後略加說明或辨析。

〈孔宙碑〉中，胡玉縉寫道：

碑稱宙「治嚴氏春秋」。考《公羊》莊八年，經「甲午，祠兵」，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何注：「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許慎《異義》引《公羊》說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鄭《駁》則以為《公羊》字誤（原注：並引見〈曲禮〉疏）。鄭君意蓋以《周禮》、《左氏》、《穀梁》、《爾雅》皆云治兵，不云祠兵，故斷《公羊》為字之誤。此碑云：「□□祠兵」，則知嚴彭祖所見經文亦作「祠」，鄭說實不足信。近孔、陳諸家，均未及此，可據以補之者也。碑又云：「兼禹湯之臯己」，此本《左氏》莊十一年傳臧文仲之言，則知張雲等雖從宙受《春秋》今文學，亦通古文學。又云：「黎儀以康」，此為《尚書》今文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勝〈大傳〉、王莽〈大誥〉，「獻」並作「儀」，是「獻」古文，「儀」今文。獻、儀聲相近，故得相假。〈費鳳碑〉、〈斥彰長田君碑〉，多用「黎儀」字，尤與此合，益知當時今文學盛行也（原注：「於卞時廳」別有說）。又「屢省乃聽」，此本〈皋陶謨〉「屢省乃成」之語（原注：東晉古文析為《益稷》），江、段、孫諸家皆云「屢」當作「婁」。證以《漢書·谷永傳》「婁省無怠」，顏注：「婁，古屢字」，說似有據。然此碑作「屢」，不作「婁」，則於上加尸未必為俗也。又「會〈鹿鳴〉于樂崩」，此為毛《詩》古文學。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潛夫論·班祿篇》、蔡邕〈琴操〉（原注：《文選·琴賦》李善注引）並以〈鹿鳴〉為刺詩，當本三家說。惟毛《詩》敘〔序〕以為燕群臣嘉賓之詩。此碑之意亦不以為刺，是可證也。又「稱彼兕觥」，亦是古文學。《異義》引韓《詩》說觥所以罰不敬（原注：見《詩·卷耳》疏）。鄭君先

通韓，故往往以韓易毛，故〈卷耳〉、〈桑扈〉箋並以觥爲罰爵。惟毛於〈卷耳〉傳祇云角爵，〈七月〉傳又云觥所以誓眾，亦謂因鄉飲酒而正齒位，以此戒眾，並不得謂兼有罰義（原注：斥胡墨莊說）。《說文》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從角黃聲，其形觥觥然，故謂之觥，俗從光。」許〈自敘〉稱《詩》毛氏，觥篆解但言可以飲，不言罰爵，則毛義更顯。此碑之意亦不爲罰爵，又可證也。其他「德音孔昭」、「夙夜□□」、「在公明明」、「山有夷行」、「豐年多黍」大都皆同毛義。然則門生張雲等兼通今古文，而宙之博學更可知矣。

胡氏此跋書於光緒癸卯十一月（圖一三），即西元一九〇三年末或一九〇四年初，文又見於氏集《許頤學林》，兩者近乎無別。⁵⁰據寥寥碑文而論孔宙及門生兼通今古文經學，可謂有識。胡氏所言孔、陳似指孔廣森、陳壽祺，前者尤精《公羊春秋》，撰《春秋公羊經傳通義》；陳壽祺亦爲經學名家，撰有《五經異義疏證》。或是因兩書不據漢碑論「祠兵」事，故胡氏先就此發論。關於「祠兵」，或云「治兵」，以及「五兵」所指，向來是漢代經學爭論之問題，許慎《五經異義》、鄭玄《駁五經異義》已述之。⁵¹胡氏據碑文而論鄭玄誤判，證據鑿鑿，毋需多言。氏所論「獻」、「儀」，約而精；所論「屢」之古文，似爲他人所未言。針對前者，皮錫瑞所言與胡氏合：「漢碑多用今文《尚書》，此三碑〔〈孔宙碑〉、〈費鳳碑〉、〈斥彰長田君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至於後者，皮氏僅言出處：「〈皋陶謨〉屢省乃成」。⁵²

「會〈鹿鳴〉于樂崩」云云，非齊、魯、韓三家「刺詩」說；結合碑文，證毛《詩》燕群臣嘉賓之說可信。胡氏此處所言恐不確。魯《詩》主「刺詩」無異議，但齊、韓《詩》未必如此。《儀禮·鄉飲酒》鄭玄注用韓《詩》：「〈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是韓、毛《詩》義同；王先謙又引漢明帝「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禦塤箎和之，以娛嘉賓」事，以及曹植「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之文，證實韓《詩》與齊、毛義合。⁵³如此，「刺詩」爲魯《詩》所主（題跋中言及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潛夫論·班祿篇》、蔡邕《琴操》，以及胡氏未提及的馬融〈長笛賦〉，均取旨「刺詩」），餘三家主燕群臣嘉賓之說，似可確定。「稱彼兕觥」之「兕觥」，鄭玄《箋》釋爲「罰爵」，與《豳風·七月》毛《傳》釋「觥」，所以

⁵⁰ 胡玉綰撰，王欣夫輯，《許頤學林》（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446-447。按：此處據拓本邊錄，並參照文集所載。

⁵¹ 陳壽祺，曹建墩點校，《五經異義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中，「祠兵」，頁139-141。

⁵² 皮錫瑞，《漢碑引經考》（光緒甲辰刻本〔1904〕），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7冊，卷二，頁28背-29正，30正。

⁵³ 王先謙，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一四，〈鹿鳴〉，頁551。

孔宙碑後漢延熹七年張雲等為泰山都尉宙立近拓寢失其真牛階平所稱陰而不肆云云幾疑為溫美今觀

宙猶尚書所載此拓神采奕奕乃知牛說不誣而高字完全辭字未壞斷為宋榻無疑恐牛所見本尚不逮是也碑稱

宙治嚴氏春秋故公羊莊八年經甲午祠兵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何注將出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

卒許慎異義引公羊說祠五兵戎戰劬櫜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鄭駁則以為公羊字誤曲禮疏鄭君意蓋以周禮左氏

穀梁亦惟皆云治兵不云祠兵故斷公羊為字之誤此碑云曰祠兵則知嚴氏祖所見經文亦作祠鄭說實不足信近孔陳

諸家均未及此可補之者也碑又云兼禹湯之身年已此本左氏莊十一年傳臧文仲之言則知張雲等雖從宙受春秋今文

學亦通古文學又云勅儀以康此為尚書今文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膝大傳王莽大誥獻並作儀是獻古文儀今文獻

儀聲相近故得相段費鳳碑章長田君碑多用祭儀字尤與此合蓋知當時今文學盛行也於中時靡又屢省乃聽此本畢

陶諫屢省乃成之語東晉古文析為益稷江段孫諸家皆云屢當作婁證以漢書谷永傳婁省無忌顏注婁古屢字說以有據然此

碑作屢不作婁則於上加工未必為俗也又會底鳴於樂崩此為毛詩古文學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潛夫論班祿蔡邕

琴操文選琴賦李善注引竝以底鳴為刺詩當奉三家說惟毛詩敘以為燕羣臣嘉賓之詩此碑之意亦不以為刺是可證也又稱

彼兕觥亦是古文學異義引韓詩說觥所以罰不敬見詩卷鄭君先通韓故往三詩易毛故卷目桑扈箋並以觥為

罰爵惟毛於卷耳傳祇云角爵七月傳又云觥所以誓眾亦謂曰鄉飲酒而止蓋位以此戒眾並不浮謂並有罰義作胡墨

說文觥兕牛角可飲者也以角黃聲其形觥然故謂之觥俗以光許自敘傳詩毛氏觥義解但言可以飲不言罰爵則毛

義更顯此碑之意亦不以為罰爵又可證也其他德音孔昭風夜口口在公明三山有夷行豈年多泰大都皆同毛義然

則門生張雲等通古今文而宙之博學更可知矣若夫泰山都尉官據范史桓帝紀永壽元年置延熹六年罷而

止范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是泰山都尉之置實不始於桓帝證以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

尉官則知泰山都尉蓋罷於是時至桓帝復立此亦從宙碑所宜知者并及之癸卯十一月元和胡玉緜記



圖一三：胡玉緜〈孔宙碑〉跋（影像為作者提供）

誓衆」不合，胡承珙（號墨莊）似爲彌合分歧，故云：「『饗』爲鄉人飲酒而正爵位，故云『誓衆』，亦可兼有罰義」。⁵⁴胡玉縉據碑文駁之，從毛《詩》酒器說，可從。⁵⁵

胡氏自注「於卞時靡」，見於另一〈漢孔宙碑跋〉。他寫：「『於卞時靡』，自是今文。段若膺已言之，孫伯淵以爲弁之俗字。俗不俗姑勿論，證以《漢成帝紀》又作『蕃』，則『卞』、『蕃』皆變之通假無疑。」⁵⁶按：「於卞時靡」一句，胡氏引段玉裁、孫星衍說論之；所謂今文說及「卞」、「藩」通假云云，均源自二人，不贅。⁵⁷

「德音孔昭」，鄭玄《箋》曰：「『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意謂「先王德教甚明」。⁵⁸「夙夜□□」（今人多補爲「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語出《魯頌·駉》。鄭玄《箋》曰：「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明德也」，馬瑞辰稍駁鄭說：「明、勉一聲之轉，『明明』即『勉勉』之段借，謂其在公盡力也。」⁵⁹意謂孔宙早晚勉力於公事。「山有夷行」，見《周頌·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鄭玄《箋》全本韓《詩》：「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⁶⁰意謂孔宙施政有道，治內安定，商旅往來不絕。「豐年多黍」，「黍」今人或誤釋爲「黍」，源自《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鄭玄《箋》曰：「『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魯、韓、毛《詩》同。⁶¹意同上，孔宙施政有道，五穀豐登。以上四句，《詩》今古文意同，似非「大都皆同毛義」。

⁵⁴ 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合肥：黃山書社，1999），卷一，〈卷耳〉，頁30。

⁵⁵ 胡玉縉跋中所引〈異義〉，參見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卷上，「罍制」、「爵制」，頁9-13。按：陳氏此書廣參諸本而疏證之，但「罍制」、「爵制」兩條，內容略同，似可商榷。「罍制」條似應析分爲二，前部分爲「罍制」，後部分可歸入「爵制」。且「罍制」文字可據《周禮注疏·春官宗伯》增補，即「如人君下及諸臣同」下，補入「《詩》云『我故酌彼金罍』，古毛《詩》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罍，無黃金飾也」一句。

⁵⁶ 胡玉縉，《許廣學林》，頁446。

⁵⁷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書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6冊），卷一，〈堯典上〉，頁11背-12正；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堯典第一上〉，頁9-10。

⁵⁸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四，〈鹿鳴〉，頁554。

⁵⁹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二七，〈駉〉，頁1068。

⁶⁰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二八，〈天作〉，頁1049-1050；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四，〈天作〉，頁1007。按：馬瑞辰所引「易道謂仁義之道」句後，《後漢書》李賢注中又有「而易行」三字，即「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又，鄭玄《箋》曰：「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

⁶¹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二五，〈豐年〉，頁1025；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二九，〈豐年〉，頁1073-1075。按：馬氏又駁鄭《箋》：「亦，大也」，認爲是「語詞」。

王仁俊在〈漢征羌侯張君殘碑〉跋文中寫道：

「張仲興周室」句，用《詩·小雅》「張仲孝友」，義與〈張遷表〉、〈張表碑〉述先德意同；「慍於群小」，亦〈國風〉文；「君恥侔比」，即「誇毗」之通借，〈大雅·板〉篇「天之方懨，無爲誇毗」，《爾雅·釋訓》誇毗，體柔也。傳用《雅》意，君羞爲體柔之人，故動輒得咎也。然伴矣優遊，不因榮辱，撓其澹定。「換斥」者，亦即《詩·卷阿》之伴矣，《箋》訓爲自縱弛之意，引申其義則優遊自得矣。「建勿剗之化」，「甘棠勿翦」《釋文》引韓《詩》正作「勿剗」。蔡邕撰〈劉鎮南碑〉，「周人勿剗」，蔡本治韓詩者。至於「□罰折中」，用《書·呂刑》；「禮樂皦如」用《論語》義；「猶昔八虞，文王是咨」，此《晉語》文；「崇保障之治」，亦《晉語》尹鐸言也。若夫「姜公樹跡，萑檀流稱」，「萑檀」即「灌壇」之異體。〈高彪碑〉曰：「流化外黃，貿昔萑檀」，例與此合。凡同聲字例得通借也。太公令灌壇，有〔東〕海神兒〔女〕不敢以暴風雨過，此先秦相傳佚事。漢碑高彪之外，惟此能引之。晉張華《博物志》乃著其詳，亦見華之無書不讀矣。

王仁俊與章鈺、胡玉縉俱爲吳中先賢，^⑫清末知名學者，世人多論其文獻輯佚之功。王氏在金石學方面的造詣，雖爲同時人讚賞，如褚德儀言其：「精小學，好金石，得一碑，凡官制同異、地名沿革考證至爲浩博，所著考證金石之書極富」，^⑬但王氏歿後，藏品散佚；金石跋數十篇，今亦不存。端方藏品所見王氏題跋可窺豹，亦可補闕。此跋尾有「五月廿二日」語，不載年代；褚德儀跋文亦及王跋，褚跋書於二十八年七月，則可確定王跋書寫時間。此碑係新出，爲皮氏所未見；吳士鑒題跋雖早（一八九一年末或一八九二年初），但直到《陶齋藏石記》引述，方爲人知。此石價值，誠如吳氏所言：「所存僅百餘字而有益於徵經，彌足寶貴」。^⑭王仁俊所書題跋，除考證碑主外，亦著重就此展開。

「張仲興周室」、「孝友順恭」句，出自《詩經·小雅·六月》「張仲孝友」，述其家世所出；漢碑陳述碑主秉性，多有「孝友」之語，如此碑「孝友順恭」。除王氏所引〈張遷表〉、〈張表碑〉外，《漢代石刻集成》中所引蔡邕〈郡掾史張玄祠堂碑銘〉，均有類似表述。^⑮「慍于群小」，見於《詩經·邶風·柏舟》：「憂心悄悄，慍于群

^⑫ 盧弼，〈許廣遺書序〉，胡玉縉撰，《許廣學林》，頁1。

^⑬ 褚德儀（德彝），《金石學錄續補》，頁31背-32正。

^⑭ 端方編，《陶齋藏石記》（宣統元年石印本〔1909〕），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1冊，卷三，〈西鄉侯兄張君殘碑〉，頁13背。

^⑮ 參見日·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本文篇》（京都：同朋舍，1994），頁296。

小」。毛《傳》：「慍，怒也。悄悄，憂貌」，鄭《箋》：「群小，衆小人在君側者」，馬瑞辰指出：「怒當作怨」，可從；韓《詩》訓「慍」爲「恚」，義同「怒」，魯《詩》同：「以不聽群小之言，爲所慍怒」。⁶⁶碑文此處似從《詩》古文學。「君恥侔比」之「侔比」，如王氏所言，即《詩》之「誇毗」，毛《傳》：「夸毗，體柔人也」，鄭《箋》：「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意謂張君恥於「足恭」——即過分謙恭以取媚於人（群小），故由夷陵侯相調任斥章（或邱）長。⁶⁷王氏所云：「伴奂優遊」云云，源自《詩經·大雅·卷阿》：「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鄭《箋》：「伴奂，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奂而優游，自休息也」，⁶⁸原意謂閒暇出遊；張君則似自我放逐，故王氏云：「優遊自得」，不因榮辱而攪其澹定。「建勿剗之化」，出自《詩經·國風·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韓《詩》：「『剪』作『剗』，魯亦作『剗』」，碑文取今文韓《詩》。⁶⁹王氏又引蔡邕所撰〈劉鎮南碑〉之文，證實此點。「□罰折中」一句，王氏以爲語出《尚書·呂刑》，似指「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⁷⁰意指公正決獄。「禮樂嚟如」句，源自《論語·八佾》：「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嘒如也，繹如也，以成」，係夫子論樂之語，「嚟如」意謂「音節分明」。⁷¹「猶昔八虞，文王是咨」，出自《國語》：「詢于『八虞』，而諮于『二虢』」，韋昭注曰：「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二虢」乃「文王弟虢仲、虢叔」。⁷²意謂張君廣咨群賢而施政。「崇保障之治」，出自《國語》尹鐸：「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韋昭注曰：「繭絲，賦稅。保鄣，蔽捍也」。⁷³意謂張君施政在於安民而非搜刮百姓。「姜公樹跡，藿檀流稱」一句，如王氏所言，「藿檀」即「灌壇」，即太公望爲「灌壇令」事；相關記載見《隸釋·高彪碑》，又見於西晉張華所纂《博物志》。意謂張君施政頗有成效，爲民傳頌。

⁶⁶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四，〈柏舟〉，頁109-110；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柏舟〉，頁132。

⁶⁷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二二，〈板〉，頁917；余嘉錫，〈漢池陽令張君殘碑〉，《余嘉錫文史論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頁558-559。按：余氏說道：「蓋漢人言遷者即今之升，言換者即今之調也」；又進一步指出，「換」有二義：「有以本官換他缺者」、「有以職秩相同換他缺者」。碑文所云係第二種情況。

⁶⁸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二二，〈卷阿〉，頁905。

⁶⁹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二上，〈甘棠〉，頁86-88。

⁷⁰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二七，〈呂刑第廿七下〉，頁539。

⁷¹ 程樹德，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六，〈八佾下〉，頁218。

⁷²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一〇，〈晉語四〉，頁387-389。

⁷³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卷一五，〈晉語九〉，頁490-491。

(三) 藉碑文以考證史實，兼論地理、職官

前人關注秦石漢碑，多從此點入手。王仁俊考證〈漢征羌侯張君殘碑〉，尤可窺見先賢治學之徑。

此碑碑主素有爭議，西鄉侯又是考察關鍵。吳士鑒起先考證為魏張既之兄，後來又認為可能是張緝之兄（張緝見於〈曹真殘碑〉），究竟是何人，未能斷定，定此碑為魏碑則如一。⁷⁴《陶齋藏石記》多承吳說，但斷定碑主為東漢末人。⁷⁵楊樹達據《後漢書》章懷太子注，考西鄉侯為東漢桓帝時的張敬，時在一九三一年。⁷⁶余嘉錫承楊說而鉤沉史料，分析碑文，愈發詳實，時在一九三三年。⁷⁷王仁俊考證之結果與楊、余同，而分析問題之視角有楊、余未注意者。先彙錄王氏所書：

右後漢征羌侯張君殘碑。張君名已佚，其仕履歷主簿、拜郎中、除夷陵侯、換征羌、後遷池□，□辟命不應。是君之門第雖以西鄉侯之兄、冀州刺史著稱，而君之勳績要以夷陵、征羌顯也。《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夷陵，陵名，後為縣，屬南郡。」《正義》引應劭曰：「夷山在西北。」據此是因夷山而名夷，因楚先王陵而名陵也。漢置為縣，屬南郡，都尉治，莽曰居利，見班《志》；東漢因之，見《續志》。以《水經·江水注》繹之，當在今宜昌府南、東湖縣東。今縣西北二十五里有西陵峽，一名夷山，與應說悉合也。君由夷陵而換征羌，蓋由楚界入河南信陽州，此楚豫聯域，當是東漢已然。由信陽至許州，今許州鄆城縣東南七十五里，古征羌侯國也。光武以來歛授命，始改汝南之當鄉為征羌國，贈歛以征羌侯印綬，故《續志》曰：召陵有安陵鄉，征羌侯國也。是知即漢《志》召陵縣地耳。《水經·潁水注》：汝水於奇頡城西，別東派，時人謂之大灑水。東北流，枝瀆右出，世謂之死汝也。別汝又東北，逕召陵城北，練溝出焉。別汝又東，汾溝出焉。別汝又東，逕征羌城北，水南有汾陂，汾水自別汝東注而〔為〕此陂，水積征羌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許。瀆左合小灑水。酈道元說《水經》征羌最詳。惟〈洧水注〉用李奇說，以安陵即鄆陵，則未敢謂然，今鄆陵縣屬開封府也。曰「復換征羌」者，蒙上夷陵，侯字以換字表之，漢碑多有此例。

⁷⁴ 參見吳士鑒，《九鐘精舍金石跋尾乙編》，頁4背-5背。

⁷⁵ 端方編，《陶齋藏石記》卷三，〈西鄉侯兄張君殘碑〉，頁11背-15正。按：是書以為「右吳君定為魏西鄉侯張既之兄殘碑，差為近似。惟吳君因既官魏，遂疑其兄之歷官；亦以魏之疆域、官制限之，此大不然……故私斷其兄之歷官必在東漢之季」。

⁷⁶ 楊樹達，〈漢西鄉侯兄張君殘碑跋〉，《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增訂本），頁301-302。

⁷⁷ 余嘉錫，〈漢池陽令張君殘碑〉，《余嘉錫文史論集》，頁555-562。

如〈楊統碑〉，換捷爲府丞；〈孫根碑〉，換元氏考成令；〈唐扶頌〉，換君繁昌令，皆是也。然則西鄉侯、冀州刺史何人也？曰張飛曾封西鄉侯，張嶷長子瑛亦封西鄉侯矣。然按《蜀志·飛傳》：飛無兄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是紹即嗣爵，紹兄早夭，未聞歷官，所至與此碑不合一也。據〈嶷傳〉：瑛爲嶷長子，明明無兄，與此碑不合二也。或據尚書張敬封西鄉侯，事在延熹二年。敬無專傳，附見〈劉瑜傳〉，然止言封爵事耳。然正因此一條，確然知此碑之立在延熹二年後，且知君爲敬之兄也。獨惜敬無傳，故冀州刺史之名闕如焉，所以斷此碑爲後漢立者。此外，更有三證。一曰地理，一曰官職，一曰經義。夷陵在三國屬吳，仍漢名耳。征羌之名則東漢始置，曹魏已不襲其名，厥後元魏乃復漢名，屬豫州汝陽耳。夫既易其地名，豈仍襲其官職？故蒙信此碑之是漢而非魏也。不然者，魏有張既封西鄉侯，既子緝嗣，見《魏志·既傳》；緝名又見〈曹真碑陰〉，所謂「騎都尉西鄉侯京兆張緝敬仲」是已。以既卒年計之，則此碑之立在魏黃初時矣，蒙是以知其不然也。況碑中經義純是漢法，絕非漢後所能作者（按：所謂「經義」云云，即上引「張仲興周室」段）。

綜王氏所論，要點有三：其一，夷陵、征羌地望，尤其是後者，言之較詳，爲他人所未論及，可與余嘉錫考證參看。其二，張君仕宦歷官。「除夷陵侯」、「復換征羌」，恐指除張君以郎中除夷陵侯相、征羌侯相，而非其本人「身錫二侯」（鄧邦述跋語）。換斥章（或邱）長事，王氏無說，故李葆恂書跋中補論之，「疑張君由夷陵左遷斥章，復換征羌，故碑文云爾。太守謂征羌蒙夷陵而言，非是」。其三，西鄉侯爲誰。王氏先引張飛、張嶷爲西鄉侯兩說，據史文駁之；又據《後漢書·劉瑜傳》所載，推定西鄉侯爲東漢桓帝時的張敬，定此碑爲漢碑，碑主爲張敬之兄，與楊、余考證同。

揣摩王氏「三證」云云，似以「復換征羌」是「蒙上夷陵」爲據，蓋指夷陵、征羌爲漢地名，曹魏已不襲用，自不會襲用漢舊官職；但從李葆恂、鄧邦述題跋可知，此處理解不確。從某種情況而言，考證張敬曾封西鄉侯，爲問題的解答提出另一種可能。只是據張敬事蹟而推論其兄，「夫當閹宦得志之時，而慍於群小，必是爲閹黨所排，然則張君亦賢者，與其弟不愧二難矣」，⁷⁸終是無可奈何事。但王氏所論經義，可補楊、余之闕；且爲推斷碑之年代，提供一新例證，使定讞成爲可能。

建安十年（205），「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⁷⁹此後所見碑石數量驟減。⁸⁰今所見曹魏碑石，如〈上尊號碑〉、〈受禪表〉、〈孔子廟碑〉載漢

⁷⁸ 余嘉錫，〈漢池陽令張君殘碑〉，《余嘉錫文史論集》，頁557。

⁷⁹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一五，〈禮二〉，頁407。

⁸⁰ 文獻及出土魏晉碑刻目錄，參見劉昭瑞，《漢魏石刻文字繫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頁155-169。

魏嬪代或奉祀孔子，非尋常事；〈曹真殘碑〉、〈王基殘碑〉、〈范式碑〉，或為宗室重臣，或名載經傳，非尋常人。且諸碑縱寬大體可知。如〈孔子廟碑〉，縱約一四八釐米，寬約九三釐米。⁸¹從綴合的張君殘碑拓本看，原石高約一百六十釐米，寬約七十釐米，較之〈孔子廟碑〉，亦不遜色。⁸²在碑禁尚嚴之時代，能否立此「豐碑」，令人可疑；官秩不顯，以西鄉侯之兄、荊州刺史之考而見稱的張君，可否由後人立碑而稱頌其功德，亦令人可疑。如此，斷此碑為漢末碑刻，似更多增一分可信。

（四）題跋與士人之生活、交際網絡

通常，飲酒作樂、詩歌唱和、遊玩賞觀是士人閒暇生活的主要情景，此為學界常識。遊園、遊山玩水外，⁸³書畫鑒賞亦是重要內容，只是關注者不多。⁸⁴在金石學復興的清代，賞觀之風更盛。賞觀對象多是奇珍異物，書畫、吉金、拓本、善本古籍及清末所出甲骨、敦煌卷子自包含在內。政事之餘，端方多與客人、幕僚摩挲、考鑒金石（圖一四）。鄭孝胥光緒丁未三月日記中，有如下兩條記載：

廿五日 午帥示〈王莽量銘〉，其文有曰：「黃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兩漢金石記》以「帀」為「市」，謬也。楊惺吾以為「垂」字。余讀「帀」作「雜」，古「雜」「帀」通用。其末句曰「亨傳億年」，說者以「亨」為「享」，余考其文作亨，乃「克」字〔字〕也，午帥然之。

廿八日 觀午帥所藏碑本。⁸⁵

鄭氏對〈王莽量銘〉文字的釋讀，確然可信。⁸⁶廿五、廿八日日記，可與菲爾德博物館端方藏品鄭氏觀款印證，亦可與傅斯年圖書館藏端方舊藏鄭氏觀款印證。⁸⁷鄭

⁸¹ 參見三國時代の出土文字資料班編，《魏晉石刻資料選注》（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5），頁103。

⁸² 參見徐玉立、李強主編，《漢碑殘石五十品》（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7），頁44。按：張君殘石縱寬不可知，所言係估算而非嚴格測定，今所存最大塊殘石拓本縱約120釐米、寬約42釐米。

⁸³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頁197-228。

⁸⁴ 學界此前關注題跋的文章儘管有，多就題跋本身立論，似較少關注其他方面，參見黃國聲，〈古代題跋概論〉，《中山大學學報》1980.4：97-105；鄧安生，〈古代題跋試探〉，《天津師大學報》1986.5：64-70；石守謙，〈隱居生活中的繪畫——十五世紀中期文人畫在蘇州的出現〉，《九州學林》5.4（2007）：29，注釋46。

⁸⁵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089。

⁸⁶ 《秦漢金文彙編》中，「帀」字與鄭釋同，「亨」字仍釋為「享」。參見孫慰祖、徐谷富編，《秦漢金文彙編》（上海：上海書店，1997），頁208。

⁸⁷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一書限於體例，未錄〈舊拓周壇山刻石延陵墓表〉、〈漢魯恭王石人題字一冊〉拓本鄭氏觀款，僅提及有鄭氏觀款。後者原物中有「光緒丁未三月鄭孝胥觀」等字樣，與菲爾德博物館藏品所見同。



圖一四：陶齋評權圖（引自：陳秀，〈端方與《陶齋評權圖》〉，《收藏家》2000.5：41）

孝胥如此，王闓運日記中「入撫署看帖數十本」、「題看碑帖半日」、「入撫署看碑」云云⁸⁸亦如是。長垣本〈華山廟碑〉，有明末至清末人題跋四十通，觀款亦近四十；鑒賞之人，如成親王永瑛、阮元、張之洞，又如朱彝尊、葉德輝等等。⁸⁹由此，更可見拓本賞觀在士人間暇生活中所占地位。故或歌詩詠之，以記此事，或直書於拓本。陳三立〈正月第二夕陶齋尙書設熊掌會飲〉中有：「醉飽恣奇賞，燦爛展書畫。詩伯出所攜，略與主人亞。唐仇六七幅，兩峰不遜謝。壯歲耕煙墨，觀者尤驚訝。蒙夙昧鑒別，迭遭程叟罵。指點溷異同，祇欲推曹霸。人生貴自憊，屠門視寶華」等語，是例證之一。⁹⁰鄭孝胥〈題陶齋所藏瘞鶴銘水拓本〉、〈端午橋制軍屬題余忠宣楷書

⁸⁸ 王闓運，《湘綺樓日記》，頁784。

⁸⁹ 王敏輯注，《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頁89-130。

⁹⁰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頁257-258。

卷〉、〈陶齋尙書屬題陶公亭雪夜評碑圖〉、〈端午橋中丞屬題秦權拓本〉等詩，從標題即可窺見內容，不贅。⁹¹

拓本有知名人物的觀款、題跋或歌詩，既可提升自身身價，亦可拓展鑒賞內容，或由此賺取潤筆。陳樹藩致端方信中提及己之所得：「茲先將拓本寄奉法鑒。又得黃小松嵩洛訪碑圖二十四頁，每頁有翁方綱題。以上各件俟有妥便，當再送呈品題，俾增身價。」⁹²至於拓展鑒賞內容，是因為某些「專業知識」非一般人所具備，「一旦此種需求形成，少數能夠提供這種專業知識的文人便等於掌握了一種特殊資源，並在適當的情況下，將之轉化成有價的資產。」⁹³因此，或賴題跋易米。王仁俊在致繆荃孫的書札中寫道：「因在京事簡，盡可兼爲跋尾，月得十篇，或作床頭捉刀人乎。長安居，大不易。不得不作此冷生涯，但得月有津潤足矣。」⁹⁴明乎此，則楊守敬兩次受端方之請而爲其碑拓撰寫題跋，雖不知獲酬多少，但絕非無償。題跋長短或亦與報酬有關。況周頤曾請王國維代筆，王氏向羅振玉說道：「夔笙蓋爲人捉刀易米者，而永又爲代之。二跋共得千字（原注：買文者以多爲貴），亦有數語道著，可笑也。」⁹⁵

拓本所見題跋或觀款，除卻文字本身意義外，尙有其他意義可供發掘。即聯繫情感、交結友朋，從而建立人際網絡。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端方任湖北巡撫，時任湖廣總督的是張之洞。兩人此前既有政事上的聯繫，彼此亦有私交。據說端方與張之洞長子定金蘭交，以世伯尊稱張之洞，故在湖北巡撫開缺之際，張氏保舉端方繼任。⁹⁶政事之外，端、張關係較爲融洽，書法鑒賞可能起到的溝通作用儘管無形，但不容忽略。褚德彝說道，張氏「博古好學，多識古籀，釋古器款識，穿穴經訓，無不洞見本源」，⁹⁷《張之洞全集》中所見〈論金石筭〉，⁹⁸即爲事證。今所見端方藏品中，下車伊始之年，有六件經張氏鑒

⁹¹ 鄭孝胥，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卷六、卷四，頁177, 167-168, 163, 124。按：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劉熊碑〉、〈沮渠安周造寺碑〉拓本有鄭氏題詩，似不見氏文集，參見中國歷史博物館編，《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碑刻拓本（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卷五，頁10, 28。

⁹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匄齋（端方）存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頁201-202。按：閻崇琚考訂此函時間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疑陳氏爲湖北道員。

⁹³ 石守謙，〈隱居生活中的繪畫——十五世紀中期文人畫在蘇州的出現〉，《九州學林》5.4（2007）：30。按：石氏所說主要針對繪畫，似亦可拓展至書法或碑拓領域。

⁹⁴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533。

⁹⁵ 王國維著，房鑫亮分卷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日記》卷一五，頁354；又參見鄭明燁，《況周頤先生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286。

⁹⁶ 劉禹生，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56。

⁹⁷ 褚德彝（德儀）述，《金石學錄續補》，頁11正。

⁹⁸ 張之洞，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10348-10399。

玩。有三件觀款題為五月，兩件為冬月（十一月）、一為嘉平（十二月）；次年，有張氏觀款者七件，集中在上半年。⁹⁹彼此有共同愛好，故張之洞有珍物時，亦請端方寓目。一九〇二年，有人挾蘇書〈黃州寒食詩卷〉真跡謁見張之洞：「文襄歎為平生所見蘇書第一。張宴召端忠敏、梁節庵、馬季立及鄉人賞之」。¹⁰⁰這種互動式的鑒賞，或許有應酬性質，但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相信會有正面作用。¹⁰¹

張氏幕僚高友唐記載一趣聞：「端方固一巧宦也，至鄂後結納梁鼎芬、張彪，投之洞之所好，之洞墮彼術中，引為同志。」¹⁰²此處所謂「投之洞之所好」，書法或碑拓評鑒恐亦是途徑之一。張氏在長垣本〈華山廟碑〉觀款後，又書：「華陰本、玲瓏山館本余皆見之」一語；言外之意恐如翁同龢觀款所揭：「華山廟碑海內三本，余嘗見其二，今乃見此第一完足之本，歡喜讚歎」。¹⁰³不僅如此，在〈韓仁銘〉題簽、〈舊拓漢殘碑〉鑒賞時，張氏均鈐「臣張之洞」。此印可歸為私人姓名印，但又不同於一般姓名印：姓名前又帶有「臣」字。臣印「本質與號印、表字印相同，『臣』為自謙之詞，一般應該用於國君前」。¹⁰⁴誠如此，由珍稀碑拓鑒賞而凸顯禮敬，又通過觀款或用印以示回敬，對拉近彼此距離、聯絡情感自是有益。

菲爾德博物館端方藏品同時代題跋或觀款者，已如上述。除此之外，傅斯年圖書館、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國家圖書館端方藏品賞玩者或書跋人，知名者尚有陳寶

⁹⁹ 張氏觀款題在光緒二十七年者，有〈孔宙碑〉（五月）、〈校官碑〉（冬月）、〈張君殘碑〉（五月）、〈韓仁銘〉（嘉平），北京圖書館所藏〈祀三公山碑〉（五月），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白石神君碑〉（冬月）；題在光緒二十八年者，有〈琅琊臺碑〉（仲春）、〈安陽殘石四種〉（孟夏），北京圖書館所藏〈華山廟碑〉（三月），傅斯年圖書館所藏〈魯恭王石人題字〉（五月）、〈漢永平開通褒斜道摩崖〉（五月）、〈漢司馬長元石闕〉（六月）、〈孝堂山食堂題字〉（仲春）。有的藏品僅有鑒賞印而無觀款，不計在內。《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多未錄觀款，此處所言據筆者所作筆記補入。

¹⁰⁰ 甘孺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羅振玉年譜》（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頁22。按：張之洞喜蘇東坡字，亦寫蘇字。《行年錄》又載：「忠敏適撫鄂，鄉人遂得與相見于官寺。忠敏題贈秦石權拓本，又出示所藏秦權十有一，累累列几上，皆吳氏憲齋故物也。」《行年錄》所載蘇書真蹟事，參見羅振玉著，〈雪堂刺墨〉，收入《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12集，頁19-20。

¹⁰¹ 參見白謙慎，《傳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264-265；黃一農、黃書梅，〈曹寅好友張純修家世生平考〉，《故宮學術季刊》29.3（2012）：1-30。按：除去題跋的文字意義外，其對拓展交際網絡，提高個人及藏品知名度，均有重要意義。一般認為，題跋在有宋一代臻於極盛，領域除書法、繪畫外，亦擴展至文學方面。或歸於藝術史領域，與傳統史學研究無關。近來的研究趨勢是，或關注圖像資料的思想史意義，或考察書畫與制度史、政治史的關聯，似較少從書畫題跋入手開展研究。白氏及黃氏的論著，或捎帶論及，或個案考述；尤其是黃氏所論，頗具典範意義。黃氏指出，「雖然中國史學界日益關注圖像及其附屬文本在研究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但要如何做最有效的運用，仍有待大家進一步的努力與探索。」圖像對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參見葛兆光，《思想史的寫法——中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140-143、145-166；書畫對於政治史或制度史研究的價值，參見鄧小南，〈書畫材料與宋代政治史研究〉，《美術研究》2010.3：12-21；鄧小南、張祿，〈書法作品與政令文書——宋人傳世墨蹟舉例〉，《故宮學術季刊》29.1（2011）：81-100。

¹⁰²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頁56。

¹⁰³ 王敏輯注，《北京圖書館藏善本題跋輯錄》，頁95、126-127。

¹⁰⁴ 王廷洽，《中國古代印章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154。

琛、湯壽潛、勞乃宣、升允、鐵良、志銳、徐世昌、于式枚、趙爾巽、張謇、梁鼎芬、黃紹箕、陳慶年、于霖逢、俞陞雲、陳伯陶、左孝同、陶葆廉、程頌萬、程志和、喬樹楠、胡嗣瑗、沈瑜慶、陸樹藩，以及繆荃孫、劉鶚、葉德輝、李瑞清、柯逢時、羅振玉、傅增湘等等。若其藏品不散，則可羅列之人更多。故謂清末政學名流多予其中，絕不為過。¹⁰⁵ 這些人中不少又與張之洞有關聯，或出自張氏幕僚，如李葆恂、王仁俊；或為張保舉人才，如梁鼎芬、沈曾桐、胡玉縉、楊守敬，但端方均結交之。¹⁰⁶ 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保舉經濟特科人才胡玉縉、俞陞雲等人，且列在一等。胡氏於此年進入張氏幕府，此前是否與端方相識不可知。胡氏〈孔宙碑〉、〈孔宙碑陰〉跋均書於本年末，私意以為正是端方結交胡氏之例證；¹⁰⁷ 文集集中的〈漢張壽碑跋〉、〈晉郭休碑跋〉，雖不載年月，均提及端方，似亦為端方藏品題跋例證。有此機緣，似方有次年「之洞會同江督漕陽端方派先生東渡日本，考察政學」事。¹⁰⁸

諸人或轉入端方幕府，為其所用，如李葆恂、王仁俊、楊守敬。彼此或以碑拓結緣而相識，故有請託。光緒二十九年，楊守敬致端方信中有言：「昨承賜碑拓本，謝謝。本擬即撰題識……未克執筆，稍緩報命，想不以為過也」；文筆一轉，請端方關照、錄取附生湯濯錦。仍在此年，寶熙亦請託端方，一則關照門人楊熊祥，設法派其遊學東洋；一則為同年、湖北候補府經歷羅善寶求一「稍優之差」，或「就近委署一佐雜之缺」。¹⁰⁹ 若彼此不識，也無共同嗜好，顯然欲請託而無門。還有一典型事例，尤能說明問題。王仁俊為端方拓本題跋眾多，考證至為浩博，這固然有經濟生計上的考慮，但也有他重用意。題跋固然可表現己之學識，從而受重視乃至被舉薦，只是頗不易直接表明。故王氏在致繆荃孫信中，一則請繆氏向端方推薦自己，參與端方金石著作的編撰：「伏維商榷彝鼎，校量文字，此千秋盛業，得附驥以傳，詎非奇幸」；一則「今年有鴻博之試，昔者曾蒙甸公謬賞，有保送之意，蓋以龍門幸列，聲價所由增也。先生其曲成之乎」。因端方尊繆氏為師，繆氏又為寶華庵常客，故受業者王氏有此「無厭之求」。¹¹⁰

¹⁰⁵ 對端方交遊圈的敘述，賴鈺勾曾有考察，可據此補充之，參見賴鈺勾，《端方與晚清展示文化研究》，頁82-120；又，饒有趣味的是，民國紀元後，這些人中有很多成為清遺民。對清遺民的研究及相關資料，參見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¹⁰⁶ 關於張之洞幕府人員，參見黎仁凱，《張之洞幕府》（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頁121-147；保舉人才，參見吳劍杰編著，《張之洞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頁683, 763, 791-792。

¹⁰⁷ 胡玉縉撰，《許廬學林》，頁451-452, 457-458。

¹⁰⁸ 王欣夫，〈吳縣胡先生傳略〉，胡玉縉撰，《許廬學林》，頁3。

¹⁰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甸齋（端方）存牘》，頁193-196。

¹¹⁰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頁533。

題跋或觀款對交際可能起到的作用，又不能絕對視之。光緒三十四年（1908），張之洞聽聞鄭孝胥評論時人語，即張氏有學無術、端方有學有術云云，以為鄭氏對端方「未免阿其所好。學問之道無窮，談何容易，彼不過搜羅假碑版、假字畫、假銅器，謬附風雅，此烏足以言學耶」。^⑪一概斥之以「假」，與六、七年前的「引為同志」、一年前「江楚千里，考古讀碑，如同晤對」迥異。^⑫之所以如此，恐與張、端交惡有關。光緒壬寅九月（1902），兩江總督劉坤一卒，張之洞署兩江總督，並密保端方為繼任者；十一月，魏光燾調任兩江總督，張氏應回湖廣本任，^⑬「端方不欲交卸，運動樞府，召之洞入都展覲；覲畢，又令之洞留京訂學務章程……困之洞于京年餘，之洞無如何也。直至甲辰春，始回任。」張氏心腹梁鼎芬「刻意結納端午橋」，張氏「惡端更惡梁」，故雙方一度交惡。^⑭更重要的是，端方督楚施政時有否定張之洞功勞意，^⑮張之洞後又反對且遊說他人抵制端方所提官制改革，^⑯政事歧見恐是雙方關係不洽之主因。不過，政治領域沒有永遠的敵人，長久混跡官場的張、端深諳此理；雙方施政乃至交往方面的互動固然存在，但張氏內心對端方的感情可由此「假」字窺見。

以上，是對菲爾德博物館端方舊藏秦漢碑拓所作介紹，並對題跋中可能引申的問題陳述拙見。從某種情況而言，上述所論秦漢碑拓的價值，是從名碑善本角度立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可以確定的是，菲爾德博物館所藏中國金石碑拓遠不局限於此。除前引程章燦文提及的未見著錄或罕有流傳的唐代墓誌外，仍可舉出數例。譬如，武氏祠漢畫像石的研究，是國內外學界持續關注的話題。沙畹或關野貞所收拓片會不時被提及，但勞費爾收集的全套武梁祠畫象石，或孝堂山石祠堂的精善拓本，無人知曉，無人關注。又如，記載開元八年（749）哥舒翰收復石堡城的〈石堡戰樓頌〉（俗稱〈八棱碑〉，圖一五），清末出土，金石典籍或有著錄，^⑰多云原石早佚。實則，此

⑪ 參見劉禹生，《世載堂雜憶》，頁58。

⑫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碑刻拓本》卷五，頁28。按：光緒三十三年（1907），端方遣使攜孤本〈沮渠安周造佛寺碑〉至武昌請張之洞題詞，張氏跋二百餘字，中有此語。

⑬ 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實日誌》（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169, 1171。

⑭ 參見劉禹生，《世載堂雜憶》，頁57, 68, 83。按：張之洞留京訂學務章程等事，端方「運動樞府」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恐非主要原因。義和團運動興起時，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員倡「東南互保」，與朝廷「宣戰」旨意相悖。事後，張氏未獲罪譴，反受嘉獎；但對清廷來說，斷無法容忍地方與朝廷分庭抗禮，也無法容忍張氏繼續在地方坐大，故有留京、入參軍機等事，參見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175-186, 206。

⑮ 參見劉禹生，《世載堂雜憶》，頁57。

⑯ 張海林，《端方與清末新政》，頁203-207, 450-452。

⑰ 參見張維編，《隴右金石錄》（民國三十二年印〔1943〕），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1冊，頁24背-26背。

碑是勞費爾第二次中國之行的收穫之一，後運往美國，今存於菲爾德博物館並作為常規展品陳列（與之同時陳列的，還有一保存完好的墓碑）。再如，《金石萃編補略》中

收錄有「化度寺海禪師墓碑」，碑文簡約，僅載「卒葬月日生年鄉里」。¹¹⁸ 菲爾德藏品〈大唐化度寺故僧海禪師墓誌〉載有「三階教」等信息，兩相參照，對考察中古時期這一佛教派或許有益。¹¹⁹

如上所言，勞費爾本人利用拓本做研究的成果不多，但他對自己收集的金石資料卻有宏遠規劃。起初，他有強烈出版石刻收集品之心，一戰爆發使得國際學者間的合作成為不可能，不得不作罷；一九二九年，一份未署名但殆可確定出自勞費爾之手的文件，更可反映出他的遠見：用十五年時間，以十二卷至十五卷的規模，整理出版中國之行所得各類拓本（石刻、甲骨、金文、鏡銘等等），並列出十二分類：基督教墓葬刻石、伊斯蘭及猶太刻石、儒家刻石、佛教刻石、道教刻石、宮殿刻石、歷代王朝刻石、墓葬刻石、書畫名家真跡、商代甲骨、金文、磚瓦及建築刻字。八十餘年前就有如此規劃，不得不令人敬佩。更令人欽佩的是勞費爾之用心：使中國最有價值的文獻能夠為全世界學者所用。¹²⁰ 至今思來，仍使人汗顏不已。



圖一五：〈石陵戰樓頌〉局部
（作者攝於菲爾德博物館）

¹¹⁸ 王言，《金石萃編補略》（光緒壬午年刻本〔1882〕），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卷一，〈化度寺海禪師墓碑〉，頁46正。

¹¹⁹ 又，位於北京的明清耶穌會士墓地多有刻石，這些刻石後來多數被毀。勞費爾的收集品中有一百多件此類拓本，並繪有標注墓碑位置的墓塋圖。這可能是惟一存世的明清時代傳教士墓塋圖，結合拓本及此圖而窺見或復原耶穌會士墓地，其意義不言而喻。因忘卻勞費爾所繪圖示出處，故以註釋形式存之。

¹²⁰ 原文是：“A work of this magnitude has never before been conceived in Europe, China, or Japan, and it will place at the disposal of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most valuable documents which China has to offer.” 參見 Hartmut Walravens, “Berthold Laufer and His Rubbings Collec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0.4 (1980): 522.

後記：從收集資料到撰寫本文，時斷時續，拖延兩年之久，於今年二月初完成全文初稿，此後屢有修訂。資料收集、寫作及修訂文稿時，得到不少師友的無私幫助。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的 Jamie Kelly 先生，熱情接待並協助拍攝；傅斯年圖書館的湯蔓媛先生，助筆者調閱傅圖所藏端方藏品；題跋錄文及印章考釋，得劉少剛、陳松長、鄔文玲、程少軒、趙容俊等先生之助；李曉菊、仲偉民、汪桂海、張瑞龍、姜萌、劉文遠、王輝、汪華龍、游逸飛等先生，或審讀全文、提出修改意見，或提供資料，或答疑釋難，於此一併衷心致謝。文中一切問題，筆者文責自負。

校記：論文評閱人就勞費爾《中國伊朗編》的翻譯問題，提出應注意杜正勝譯本；編輯就部分文字的釋讀、句讀及文獻版本等問題，亦提出不少改正意見，使文章盡可能的減少失誤。於此敬致謝忱。